

第二章 开拓现代柳州城

移师柳州

在柳城沙埔一带的村民们，流传着这样一首山歌，高度概括了广西的连年战事及其结果：“先是陆荣廷，后有沈鸿英，打死打活韩彩凤，打得江山李宗仁！”

论职务，韩彩凤不过是陆荣廷手下的一名师长。论名声，他也不能与其他三位相提并论、同日而语。但因为韩曾多次占据柳州，退役后又一直家居沙埔，故而成为这一带乡民们嘲讽的对象。

实际上，从1921年6月孙中山讨伐陆荣廷起，到1925年7月新桂系统一广西止，广西人民经历了四年的战乱，兵灾匪祸，纷至沓来。粤军、湘军、滇军、黔军、赣军……都曾不断地骚扰、蹂躏过八桂大地，鱼肉过广西各族人民。加之当时“有枪便是草头王”，绿林土匪也乘机兴风作浪，为害四方，黎民百姓苦不堪言。桂人思治之心，应是“久旱如盼云霓”。

李、黄、白统一广西，结束了多年的战乱局面，自然是广西人民所乐于见到的。而李、黄、白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以及后来适应北伐战争的需要，也必须对广西的经济作一番规划建设。

刚刚夺取政权的新桂系，来不及健全政府机构，便将全省划出若干个辖区，设立清乡总办公署，委任各路军队首领为清乡总办，大举清乡剿匪，以彻底消灭陆、沈的残余势力及称王称霸的草盗匪寇。白马山战役之后，在梧州稍事休整补充兵员的讨贼军第二军第二纵队，在司令官伍廷颺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赴柳州。伍廷颺被任命为柳庆清乡总办公署总办，成为柳庆各属最高的军事首脑、地方行政长官。柳庆为柳州、庆远之简称，实为1913年至1926年的柳江道，辖马平、来宾、迁江、柳城、罗城、南丹、河池、宜山、天河、象县、融县、雒容、三江、忻城、思恩等15个县，柳庆清乡公署设在马平县（今柳州）。

伍廷颺部此次移师柳州，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同时肩负建立地方政权、发展地方经济的重任。对于当时的情势，伍廷颺感慨良多，他曾对部下说，自共和以来，破坏多而建设少，搅乱社会的事情多而有利于民众的事情少，不断的变化和动荡，使民众的生计艰难，大家只得到共和的空头名义，却没有得到共和真正的实惠，其原因是由于军阀专横，而民众的意愿无法表达。民国十年以来，广西土匪猖獗，柳庆一带更是遍遭匪患，残破不堪，为争夺权力、地盘

与平定土匪而不断地动用军队，发生战事，根本来不及进行治理。幸而现在全省已经统一，在一致的旗帜下开创新的局面，省里专门设置了建设厅来兴办建设，以有利于民众的生活。

伍廷颺既任柳州的最高军事长官，在当时军政合一的局面下，“驻防此地，负有建设一切的使命。”对于治理、建设地方自然责无旁贷，伍廷颺深感责任重大，他诚恳地向地方各界人士表示“廷颺不才，戎马半生，未知为政，既负维持柳庆地方之责，勉求斯民福利之方，深愿与此邦诸父老兄弟，极谋生聚教养之道，积极建设。”“廷颺一公仆耳，顺民意之所向，职责之所在”。①

对于建设地方的指导方针，伍廷颺与幕僚们确定为，地方刚刚得到安定，百废待兴。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得以开创的眼光来治理柳庆，而不能以保守的态度来治理柳庆；要本着风雨兼程、一往无前的精神来开创柳庆建设事业的新纪元，切忌重蹈过去只说空话不办实事的覆辙。

从这段话里透视，可见伍廷颺不仅有以民为本的襟怀，还表达了一种锐意进取，绝不因循守旧，绝不敷衍搪塞的开拓者气概。而且，他还充分估计到将遇到的困难与挫折，提出要以风雨兼程、勇往直前的精神，来开创一方建设事业的新纪元，应当说，这在军阀割据、争权夺利的当时，的确是远见卓识的。

1925年9月，黄绍竑出任广西民政长（相当于今省长），主持全省的行政事务。他要求地方长官积极筹办建设各项事宜，筑路通车乃全省当务之急，是重中之重的战略决策。因为道路是国民经济的动脉，不论于军事、经济以至民生，都是不可或缺的。加之新桂系主政广西后，地方比较安定，生产复苏，各类物资的交流猛增，也提出了建设交通的诉求。

自清末以来，南宁、桂林、柳州、梧州，相继成为重要的城市和交通枢纽，民国期间，旧桂系统治广西十多年，修路却是乏善可陈，只修筑了130公里公路，其中一段42公里，还是陆荣廷为了自己往来方便，从家乡武鸣修至南宁的。

地处桂中腹地的重镇柳州，是通达邕、桂、梧三地的枢纽，若要修路，不论出于政治、军事的考虑还是经济建设的需要，新桂系当局把柳州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百废待兴的柳庆，仍数开辟交通、修筑公路和架设电话线路为重中之重，对此的重要性，伍廷颺曾向各县的知事说：“如果想图进步发达，简单说来，必先使那地方交通事业发达，才有进步的希望。”

从《柳江各属行政会议纪事录》里的《筹办交通案》一文中可以看出伍廷颺的观点。他认为，交通不便，则文化不开，各种事业的发展便无从谈起，柳庆这一带应通过积极筹款来举办交通。但是，铁路和无线电通讯的建设耗资巨大，短时间难以完成。而长途汽车、公路及公用电话，虽说费用少而利也不多，却可以快见成效，能够为柳庆民众谋取利益。为什么呢，人步行走一天的路程，汽车一两小时就可到达；一个人挑担，最多也就是百十来斤，有马路汽车，则一人所运输的货物就是原来的数十倍了。

至于安装电话后的好处，那是不可胜数，柳庆人民大多僻处乡村，一旦遇警，须要向邻近的民团请求援助或向官府请兵，平时须一天或两三天才能到的，有了电话则呼应灵通，即便发生土匪袭扰的事，有邻团把卡，官府围拿，那就异常神速，很快可以肃清。凡此种种，都是有利民生的。

伍廷颺特别强调交通和实业建设，他认为这两件事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必经途径，因为要发达生产，便不能不振兴实业，要振兴实业，不能不注意交通，衣食住行，四大需要，都是由这里出来的。

对于交通，伍廷颺又有颇为形象的说法，他说：“有‘人的交通’、‘物的交通’和‘消息的交通’三种……架设电话，以求消息的敏捷，时间的经济。”^②

勿需讳言，公路和架设电话这两项建设除了对地方治安与经济建设有诸多好处外，其军事价值也是不容低估的。

伍廷颺说干就干，很快成立柳庆交通筹备处，网罗工程技术人才，发动地方绅士集思广益，共同谋划，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勾划了柳庆地区修筑公路、架设电话的理想蓝图。

1925年9月17日，伍廷颺致电广西民政长黄绍竑，陈述了拟筑设柳（州）庆（远）长途车路及电话的设想：

第一，由柳州至思恩电话已架设。由思恩至黔边隘程约200里，已改设长途公用电话。

第二，车路先筑石龙至柳州，再由柳州至黔边，以聘定工程测量各职员回柳成立柳庆交通筹备处，即着手测勘路线。

第三，车路工程拟兵民分段，同时合作，只给伙食，以股票为工资，已经各县知事、绅民赞助。

第四，开办及购用工程器具并路局经费，已指定柳庆两河护商局收入为交通专款。

这一设想，不仅就修路的技术问题做出规划，还提出了劳动力的来源（兵民分段）、工资给付（股票）、经费来源（两河护商局收入）等建议，得到黄绍竑的大力赞赏和支持。

9月19日，广西民政署任命伍廷颺为柳庆公路局总办。27日，民政署准伍电所请，委唐熙年为坐办，并定准9月1日起，柳庆、长安护商各局收入，完全拨充该局经费。

1925年10月4日，柳庆公路局成立，总办伍廷颺同时就职，在柳州北门大街旧守备署正式对外办公，并分路线为四：先修柳州至石龙直达黔边一路，其柳三、柳桂、柳邕各路，则次第策划组织。公路局工作人员有22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6人。伍廷颺还特聘了留美学者、工程硕士盘珠衡为总工程师。

按广西民政公署的确定，柳庆公路总局的职责为：1、规划柳江区的公路路线。2、筹集筑路经费。3、征调修路之民工。4、督促各条公路之建筑。

筑路的蓝图虽然铺就在眼前，但是，乱后初治的残酷现实缠绕着伍廷颺，要修路谈何容易！

① 《柳州民国文献集成》第二集第2页。

② 伍廷颺：《新广西建设之过去与将来》，载《新广西旬报》第二卷第十号。

清乡剿匪

当时摆在伍总办面前的就有三大问题：1、匪患骚扰，治安问题。2、货币市场混乱，金融问题。3、缺少资金、钱粮问题。

先说治安问题。广西素有“无山不洞，无洞不匪”之说。老百姓口里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土匪到处有，司令满街走”，极为形象地描绘了土匪之多，难怪每个村庄里，“放牛要背枪、割谷也要背枪”。广西地处贫瘠，老百姓本来就穷，加之战乱多年，兵祸横行，匪患猖獗，治安没有保证，何谈修路！从以下部分记载，可见柳州匪患之一斑：

宣统元年春，柳州八属（马平、雒容、柳城、融县、怀远、来宾、象州）……劫掠抢夺几乎无日不有，而尤以柳城为最。

民国十一年柳州城厢以外散兵充斥，土匪遍布。他们在水旱要道广设关卡向旅客强收“买路钱”，仅柳州至柳城长塘圩，兵匪设下的关卡即有13处之多。

民国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下午三时，柳城新维村耕牛被匪劫去 6 头，牧童飞奔回村报讯，村人持械追击，至十里许始将牛全部夺回。

长塘镇境内古木坳，长 2200 米，海拔 113 米，是一条仅能容两人对行的山隘，坡陡路窄，崎岖难行，客商经此，常遭抢劫……①

为稳定治安，保证修路的正常进行，伍廷飏调动军队清乡剿匪。同时调查户口，清除“奸宄”，查验民枪，编定甲保等等。而最为重要的是组建民团，建立一支地方武装力量。

为此，伍廷飏频频召集各县知事开会，专门研究民团如何严密组织，清理团款，训练团员等。因为一个旅的兵力要剿灭柳庆十几个县的土匪，还要保护新生的地方政权，保护筑路任务的完成，毕竟“手长衣袖短”，力不从心。

在伍廷飏的积极指导和督促下，清乡办公署首先制定了《整顿柳江各县团务案》及《整顿柳江各县团务章程》。柳江自“民十”以来，盗匪遍地，民不聊生，火热水深，痛苦不堪言状。经伍廷飏举办清乡之后，各县才获得初步的安定。但是兵来匪去，匪去兵来，欲求根本肃清匪患，实现长治久安，一定要建立民团，具备自卫能力不可。因此整顿柳江团务，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事情。而整顿的方法，首先在使团章完善，让各县有章可循。其中经费（团款）就是重要问题。有的因团款不足，不能多养团丁；或因区内贫瘠，无款养丁，以致无法抵御土匪。也有区内团款充足，不养团丁而将钱中饱私囊的。如果不认真清理，调剂款项，把钱多的适当拨给钱少的话，那就收不到实效。而如果办团人员没有军事知识，则指挥无方；无政治常识，则宗旨不定。一旦有事发生，就会听人煽惑，误入歧途。因此，应立即设立团务职员教练所，调集各县办团人员入所训练，养成办团人才，以资整顿，则小可以御匪，大可以卫国。各县民团，就可以收到自卫的效果了。

伍廷飏组织整顿民团，首先要筹措经费，从抽收户口捐或附加赌屠捐中分摊。对于贫苦和富裕的地区要求不同，贫穷地区若每月收入不够支付练丁的饷薪和公用开支的，由总局设法支足。富裕地区每月收入除付给练丁饷薪和公用开支尚有盈余的，余款按月缴解县总局存贮，或挹注别区之用。这些举措和规定，使经费得到调剂和保障，民团能够正常运转，其训练、执勤得以进行。

伍廷飏在柳州、庆远设立“民团职员教练所”，既训练各团务分局的现职局董、总督队、督队队长等骨干，又分批分步骤的训练团丁。对未经训练者，概不准任用。以此保证团丁的质

量。

由于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在 1926 年 7 月伍廷颺召集的一次各局团务会上，与会人员统一了认识，一致表示要“各尽其力，大干一场”，“为民众谋利，为桑梓造福”，并决定以 3 个月的时间绥靖柳庆全境。各县团局据情随时准备协同军队围剿、堵截、追歼流窜于思恩、宜北两县边境的蔡鸿生、覃幸霖、覃炳妹、谢晚等四股土匪。

伍廷颺赏罚严明，对支持民团清乡剿匪得力的知事给予褒奖，对防范不力者则毫不客气，给予处分。如来宾县局董何德广，率民团击散大帮来犯股匪，捕务得力，伍廷颺以总办的名义下文，对所有在事人员，报民政厅查明核奖。

思恩匪首覃杏林等勾结匪帮，乘防军调动，攻破县城，掠捉人口，劫掠财物，焚毁卷宗，放走监犯、异常猖獗。虽经调团收复，军部派队协办，仍然失去县印，警练受伤多人。为此，伍廷颺认为，该县知事防御不力，应受处分。

各处民团的组建，确实遏制了匪患的猖獗。如忻城的匪首彭天福被护路队擒获，罗城县土匪李亚明逃至融县被捉；在宜北南岗一带横行的土匪被进剿，匪首罗锦华逃到忻城被抓获；柳城县要匪郭生利被石岩区团局缉获；马平县擒获匪犯廖有利；象县匪首周桂廷、卢得生被擒获处决。柳城匪首汤猪佬、一区匪首许日福等纠集匪徒 60 多人，有枪四五十枝，扑攻喇樟村，被总局常备队协同相关分局各团丁围住痛剿，激战竟日，土匪损兵折将，只剩数名窜逃深山。所有这些，都相对保证了日后修路架线工程的顺利进展和社会治安的稳定。

但是，要想根除匪患，实属不易。仅以聚啸于柳州洛满、柳城一带深山的沈崩鼻、赵桂芳一伙匪徒为例，他们就横行多年，直至 1932 年 10 月底，才被一网打尽，彻底剿灭。

历经数月的努力后，各处大帮匪股多已歼灭，但是，其余零星散匪深藏在众多的高山老林里，时常窜扰百姓，干扰公路建设。而军队时有别的任务，实难顾及。伍廷颺不得不成立路警中队，以长期保护公路建设和旅客的安全。

柳庆地区成规模的清乡剿匪的活动，一直持续到 1927 年 4 月 1 日才告一段落。当时，省政府来电报称赞说，柳庆清乡总办公署成立两年，办理清乡事宜，柳庆民众已可安居，清乡事宜自应结束，所有柳庆清乡总办公署撤销，残余土匪可由部队剿灭。伍廷颺关爱部属，对清乡办公署的人员，无论职员兵夫等，加发恩饷一个月，以示体恤。

广西匪患的滋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不是三言两语能分析清楚

的。伍廷飏审时度势，通过清乡剿匪、组建自卫民团等一系列措施，还是收效显著，赢得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为修筑公路、实施建设创造了较好的一方环境。

①《柳州古今》1991年第3期，总第7期。

筹款征粮

修路没钱肯定不行，而金融货币就有不少问题。

广西自1921年以来，兵事不断，各路军阀你来我往，最苦的自然就是百姓，其中货币就五花八门。市面最早流通的是陆荣廷发行的省币，后来是广东银毫及铜元。“乱红头”时，滇黔军强迫市民使用背面铸有唐继尧肖像的伍角中洋，其质量低劣，且要与广东银毫平用，为此纠纷不少，造成市场混乱。

后来号称自治军总司令的林俊杰率部进驻柳州，在小南门华隆印刷厂印刷壹元纸币，纸质不佳，强迫市民与广东银毫通用，慑于乱军淫威，百姓不敢不用，却又极不情愿用广东银毫和铜元找补，以避免更大损失，因此交易极不方便，纠纷甚多。

接着，又有号称“前敌指挥”的黄芝生从桂林率部占据柳州，带来“总司令”梁华堂自行印制的纸币，强行在柳州市内行使，百姓更是苦不堪言……

有人统计，各路军阀仅在柳州发行强迫使用的纸币有13种之多，先后都成了废纸，更不必说广西了。由此可见货币市场混乱之一斑。

为彻底整理货币市场，时任广西民政长的黄绍竑在梧州设立造币厂，铸造面值贰角的广西嘉禾银币计600万元，后又成立广西银行，发行伍元、壹元、伍角、贰角纸币，在广西境内流通。

在新币替代旧币的过程中，折换是一个问题。银行虽有明文规定，但有些不法商人抵制折换。10月，再次发生银毫风潮，几天内纸币忽低至六成。伍廷飏召集商会理事会议，商定市面西毫用法：将成色高的各种西毫加盖药水英文“柳”字印，一律通用，不得低折。无印者不得流通。伍廷飏又以清乡公署名义公布禁令八条，通令各署照办，严格执行。一方面召集各界会议，组织物品平价会及宣传队、侦察队等，共同平抑金融市场。

经过调查核实，发现济记公司、宝泰祥、而行生、永生祥等 4 间商号，均已六成几行使新纸币，证据确凿，实属可恶之极。伍廷颺毫不留情，对轻者罚款，重者立刻拘留该号的司理或老板。消息一经传出，不法者噤若寒蝉，风潮平息，新币终得顺利流通，市场交易恢复正常。老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修路就得有资金，钱从何来？伍廷颺为筹款是颇费一番周折的。

他首先想到的是对上，即向省里呈请拨给，这包括：

一是动用护商经费收入。过去没有公路、铁路，商业物品只有走水路运输。运输途中，为防止土匪抢劫，商旅不得不请求政府派兵保护。政府护商局便按货值 3%比例收取护商费。柳庆融江、龙江两河收到的护商费原来全部押交省里。伍廷颺极力电请，广西民政公署准拨作为柳庆公路总局经费。自 1925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927 年 7 月 1 日裁撤护商局前 1 日止，所有两河护商收入均解柳庆公路总局核收，平均每月约 5 万余元毫币。

二是 1926 年度粮赋。广西省政府以柳宾路关系重要，令饬柳庆公路总局赶筑，并将柳庆全属各县及宾阳县当年度粮赋全数拨充修路费；从当时财政厅一份《筑路经费不得拨充别用》的文件中，也有记载，该文列举了一封直接发给伍廷颺的电报，批准将柳庆各属及宾阳县全年的“正赋”，拨给充当修路经费。而当地官员和军队的薪饷，则另外由政府指定拨给，如果军队有额外的开支，由各县另外设法，不得动用“正赋”，以使修路经费得到保证。

三是省政府拨款。1927 年 6 月 30 日两河护商经费停征后，筑路经费缺额甚大，柳庆公路总局呈奉广西省政府核准，所缺款项由省财政厅和建设厅拨充。

再一个是向下，即向百姓征或借，这包括：

一是加倍征收路款。柳庆公路总局自 1926 年度起，将柳庆属各县及宾阳、武宣两县粮赋加征一倍，以三年为期，作为筑路股本。

这事说起来容易，办起来就难了。柳庆一带地方本来就不富庶，多年战乱之后，再加旱涝水火各种灾情，民生的确艰难。这里特别要说的是 1924 年的一场洪水，7 月上旬，柳江水陡涨，稍退后 9 月复涨，最高水位 90.94 米。水由下水道泛入道台门前三角地、弓箭街一带，水深 1 至 2 米。城西、南、北皆被水淹，苏杭街南段大半被淹，房屋被冲塌无数。所辖各县自然也受灾不轻。因当年是干支甲子年，就被柳州人称为有名的“甲子大水”。城市尚且如此，乡村之困苦不难想见。

二是借款。因各路分段同时兴工，需款甚巨，收支不能相抵，惟有设法借款，主要是向广西银行借。伍廷颺曾多次借款，最明显的是1926年10月，借款10万元，交由盘工程师前往广东购置筑路材料。

有时为发工资以解燃眉之急，伍廷颺也以自己的私人名义向银行借款。有一张借条曾注明：本息共达西毫五十万零四二二元六角一仙一厘，东毫一万元，此款直到伍廷颺担任建设厅长后，才由建设厅向银行借款拨还。

另一种是向私人借，其中之一是统一从被征筑路的民工工资中借。《柳庆公路总局筑路章程》中规定，参加筑路的出工者，每人每日发给工资4角，其中伙食为1角5分，其余2角5分待工程完竣后发给股票作抵。实际上，后来由于战乱、政局变动等种种原因，所发股票并未能兑现。

三是杂款。一是以资抵工之款，对凡有资产而不能按规定出工的男子，准以资抵工，每工以4角计，按所派的工数收缴；二是违抗征工的罚款。

开挖第一路

在伍廷颺兼任柳庆总办期间所开修的多条公路中，最值得一说的当是柳（州）石（龙）路的修筑。柳石路不仅是柳州的第一条公路，也是新桂系主政广西后修筑的第一条公路。柳州位于广西中部，自古“为骆越要害”，“地属冲要”，远在晋代和隋代，已修通往贵州、安南（越南）河内的道路。

中唐以后，有道路通桂林、南宁，宋代以后，马平县的驿道经历代开辟和修整，道路渐渐增多，质量逐步提高，至清代，马平县的驿道网络渐臻完善，主要驿道与水道相连接，县治柳州已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沟通四邻各州、县。

民国初年，马平县陆上仍依靠旧驿道与外界沟通，城内道路多为青石板路，比较狭窄，曾有画家根据老人们的回忆，创作了一幅漫画，描绘当时柳州的西门街也就是今天的中山西路的情景：蹲在街这边的人，可以把烟杆伸过街，和街对面的人对火点烟。漫画或许夸张一点，但当时街道狭窄却是不争的事实。而在广大农村，只有崎岖不平的牛车路，道路运输完全是牛车，

或肩挑人抬。真正能通汽车的公路，一条也没有。

这样的道路，自然是无法适应经济的发展和进步的。1921年8月，广西省长马君武秉承孙中山关于发展交通的意旨，下令筹建邕宁（南宁）至马平县治柳州的公路，次年5月，刚建成南宁至四塘22公里路基，因政局变化，孙中山率师返粤，马君武去职，道路停建，邕柳公路建设遂成泡影。

因此，伍廷飏主持修筑的柳石路，自然会万众瞩目，也就更具有不寻常的历史意义了。他实施“兵工政策”，“化兵为工”，动员所属部队的士兵，一手拿枪杆子，一手拿锄头修路。那些比较得力的官佐，挑选到各路段去指挥、监工。他要求部属拿出打仗的劲头来投入修路。凡是修路不得力的，排长照样“炒排骨”，连长照样“吃莲子”，也就是说照样被撤职，看谁敢偷懒怠工？

该路于1925年11月10日由柳州立鱼峰南麓开始测量，路线实长100华里。同年11月14日起分段陆续征工兴筑。因为是新桂系统一广西后动工修筑的第一大工程，自然引起各方关注，伍廷飏更是特别重视。

14日这天，秋高气爽，风和日丽，身穿一色校服的省立四中学生，列队整齐，挥舞彩旗，鼓乐喧天地来到立鱼峰下，参加柳石路的开工典礼仪式。

伍廷飏亲自率领坐办唐熙年、技正盘珠衡及所属部队，和一干民工在公路起点立鱼峰山脚下聚集。只听伍廷飏一声令下：“开工！”军人、民工、学生等挥锄挖土，平整荒地。

有“伍总办”、“伍司令”亲自荷锄上阵开挖第一路，工地上热火朝天的盛况可以想见。多年来，兵来匪去，只有“司令”荷枪带头劫财抢物的，哪见司令挥锄上阵修路的！伍廷飏的身先士卒，的确给民工们作了表率，而且，来参加开工典礼的学生和各界人士，每人还得到公路总局发给的一份点心作为礼品，这自然成为轰动柳州城乃至广西的美谈。

筑路民工来源，伍廷飏最初采用征工制。在他主持制定的《柳庆公路建设章程》中明文规定：“凡路线经过之处左右三十华里内，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除有疾病之外男子，均有被征筑路之义务。”

施工时，将每条路划分若干段，每段设办事处，配主任1人、段长2人，组织民工按要求兴筑。以50人为一组，每组派工头1人，督率做工，限定竣工日期，以促成功。

这一方式试行一段后，效果不佳，其原因被经常到工地视察工作的伍司令发现了。原来，

民工中时有偷懒怠工及以老弱顶替种种情弊发生，造成工程进度迟缓。伍廷颺把那些老弱病残者清理回去，召集幕僚商讨对策，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以保证修路的顺利进行。

从1926年9月起，筑路改用征包制。即于征工制中参用按村包工办法，视村落之疏密，民工之多寡，工程之简繁，施工之难易，就各段中再分为若干段，以额定伙食完成规定土方，限定竣工日期。倘逾限不能完工，所逾限外日期不给工资，务以该段工程做完为止。征包制自实行后，各路进展迅速，收效显著。

为了使修路工程更加加快速度，伍廷颺报请民政署批准，在公路途经的马平、宜山、象县等相继成立公路分局，并由所在县知事兼任局长，亲自抓修路。1925年11月20日，民政署还特批伍廷颺一把“尚方宝剑”，准予他“对于放弃公路、清乡两事之所辖各县知事，得随时检举撤换”。

当时，全省与柳石路几乎同时期动工的还有邕宾、邕龙、桂蒙、桂全等多条公路。与以上路段相比，柳石路修筑的进度和质量无疑是领先的。当时出版的《道路》期刊对柳庆公路之急进如实作了报道：“伍司令廷颺自任柳庆公路局总办后，对于路务积极进行。柳石一段，兴工不过月余，已成五六十华里，路基之坚实与建筑之得法，且为全省之冠可见其热心路政之一斑。此段工程闻不久即可完工，惟沟渠桥梁尚未兴造，现已购置材料，一面赶紧建筑，一面派局技士李巍下粤购买汽车及需用器具，大约通车为期不远……”在分析和探讨柳石路的成功经验时，是因为“伍司令廷颺实行兵工政策，颇符‘化兵为工’之旨。”“富者以钱代工，每工四角；贫者以工作股，每日仍给回伙食一角五分，平均每日约有二十五人作工，故工程之进行非常迅速。”

柳石路全路分为四段修筑：由柳州立鱼峰至白面塘为第一段，白面塘至土桥村为第二段，土桥村至道公社为第三段，道公社至石龙圩为第四段。沿路多为山坡丘陵，山岭时有起伏，土质以黄土居多，间或杂有沙石；经过水田的地方不到半里，地势平和，施工并不困难。

但是，当时测量没有仪器，就靠目测，或用竹竿顶替标竿，用牛绳代替匹尺，一边测量一边修路。遇山便绕道，有水搭便桥。只求通得过汽车就行了。筑路的民工和士兵谁也没有见过汽车，汽车有多大，象什么样子，一概不知道，连工程技术人员也把公路称作“车路”。有的人甚至于怀疑，路修这么宽，过得了几架牛车，有没有必要啊？

没有筑路机械，全靠民工用锄头挖土方，肩膀挑泥，钢钎撬石头，牛车运石料，前前后后

动用军民 9490 人。沿途修建小桥 8 座，木涵 4 道，瓦管涵 4 道。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1926 年 9 月 20 日，长 58 公里、宽 7 米的柳石路全路建成通车。

柳石路成为柳州的第一条公路。这条路虽然是泥沙路，且弯度、坡度、平整度都不符合今天的标准，可是，它毕竟是柳州向现代化交通发展的起点，是历史上一道不息的亮点！

由伍廷颺拍板决定，从柳州至各地的公路计程，起点以立鱼峰山脚为准。

据资料统计，修筑柳石路共耗银 133000 元毫币，其中用于民工伙食费及雇工工资共 81000 余元，建桥梁用去 8000 余元，其它费用 40000 余元。

1928 年 11 月，省建设厅派出技士顾光实、黄钟汉等人，对柳石路作了全面的调查和验收，所得的结论报告是：柳石路起于柳州总车站，路宽 24 尺，柳湟路之一段。经羊角山，过石拱大桥，桥长约 100 尺，为全路最长之桥梁。过石牌坊、四方塘、新兴，达穿山，有穿山车站，离柳 60 里。沿路备有碎石，预备敷筑路面。经木山、大蒙，而至石龙，有石龙车站。所经各处，地势虽有起伏，然绝不经高岭，路面平整可观，桥梁工程稳固。

柳石路通车了。从石龙到柳州，乘船上行需要一天多的时间，而汽车行驶仅用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柳州至石龙的时空，在骤然间缩短缩小。赶牛车的老农，贩运货物的商贾，从梧州乘船到柳州的旅客，无不啧啧称叹：“修公路好啊，如今方便多了。”

80 年后的今天，柳石路自然早已铺上水泥或沥青路面了，沿途的风物也早已不是当年模样，尤其是柳州市区内的路段，路两旁的高大建筑自是今非昔比，但是，谁要是细心地测量一下，还会发现，如今新路的走向仍然和 80 年前一样，这不得不感谢伍廷颺和他的部属们当年的前瞻性！

向现代文明推进的盛会

1926 年 7 月 1 日至 11 日，由伍廷颺主持召开了柳江各属行政会议，专题商议如何建设柳州的各项大事。这次会议，是柳州建设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用表决的方式讨论通过了《整顿柳江各县团务案》、《柳江各属平民工艺厂案》、《柳江各县推行社会教育案》、《筹备柳江农林试验场案》、《筹筑柳江各属公路及架设公用长途电话案》等多项议案，全面推进柳州的

身为清乡总办的伍廷颺，首先提出的就是治安问题，由于当前民团组织太不完备，自卫能力太过薄弱，办团人才极为缺乏，故整理团务、训练团员实为当务之急。

其次是交通问题，计划修筑四大干路：第一路由象县石龙经马平、宜山、思恩直达黔边大河坡；第二路由柳州经长安至三江；第三路由柳州通桂林；第四路由柳州通迁江、来宾。四条路总计有 1400 余里。征工筑路每华里至少需银 1000 元，四大干线需费 141 万元。再加建筑车站、购置车辆、附加长途电话又需费 20 万元，共计 160 万元。因筑路经费不足，拟加征钱粮一倍，作为借款充作筑路之用。

第三则是教育问题。职业教育方面打算筹设平民工艺厂，社会教育方面打算设立柳江日报社。

在实业生产方面，计划先办农林试验场，农业方面注重育种及栽培，林业方面注重育苗及造林，再办高级农科中学培育人才。筹办各县市乡农会以图农事改良，举办柳江农务局统理柳江农业等等。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伍廷颺还根据修筑柳石路中有人怠工及老弱病残者顶替，造成工程迟缓的教训，在会上提出为保证修路的按期完成，最好于征工之中兼带包工性质，积极进行，要求在最短时间内筑成这千余里车路。后来的实践证明，他这一决定是十分正确的。虽然会议的宗旨和各提案的内容与会者早有所闻，但伍廷颺所具体提出的四个方面的宏观规划和大胆设想，既让人振奋鼓舞，又令人震惊，因为保证修筑公路要加征一倍钱粮！

与会者中除各县知事外，还有一些代表，是初次听伍廷颺讲话，对这位“血战沙埔、五得五失白马山”、“铁腕治商，快速平息低折风潮”的伍司令还多少有些心存畏惧。可是，通过一次代表发言，大家就打消了顾虑，敢于各抒己见，踊跃发言了。那是因为伍廷颺既善于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包括反对意见，也能以理服人，坚持原则。

7月7日这天，伍廷颺提出整顿柳江各县团务案交付审查时，宜山县知事钟秀杰大胆提议，把第四章第一条“即由伍总办印发令饬各县知事”改为“即由清乡总办令各县知事”。这样一改，就把“伍总办”删掉了，看似对伍总办的不恭，但实质于事有益，因为议案通过后是长期管用的，而伍廷颺毕竟不可能长期兼任清乡总办，一旦他调任或辞职，均不影响议案的执行力。钟委员言之成理，得到与会人员的支持，交付表决时伍廷颺本人也投了赞成票，顺利通过。

又如柳庆公路局总工程师盘珠衡对于《柳江日报采访新闻及派报收费各办法》第三条中

“得呈请清乡公署”字样有所怀疑，因清乡公署不是长设机构，清乡结束即须撤销。盘的提议获得马平县知事黄勉、柳庆公路局坐办唐熙年的附议，伍廷颺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欣然同意了盘总工程师提出的修改意见。

对于如何筹措筑路经费问题，与会代表争论得相当激烈。各县知事和代表列举受灾情况，纷纷提出要求缓免附加征收。

对此，伍廷颺斩钉截铁地回答说：“附加钱粮是用来建筑公路和架设公用电话线用的，如果不加，这两件事都办不成！而这两件事，是柳庆眼下当务之急，是目前最急需、最重要的事业，不能因一时灾害就停止不办，更不能因一时灾害，使附加钱粮停止征收。旱潦无常，难道就因为今年有水灾，明年有旱灾，使交通事业永无举办之日吗？”

来宾县代表蒋致祥提出建议：“伍总办，这两件事的确应该办，附加钱粮，我本人也同意征收，但据一般民意，都希望另外筹款，不要征附加钱粮。”

伍廷颺解释：“征收附加钱粮是负担最平均、最公正，也是相对来说较为容易筹集巨款的办法。修筑公路、架设电话线这两件大事，开支巨大，除了征收附加钱粮，是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取代的。如不附加，这事肯定办不成了！”

一位来自罗城的代表多次发表意见：“我们县连年遭受兵燹匪祸，老百姓憔悴已极，若再增加这些负担，那就更加憔悴了！是不是等秩序恢复正常以后，才开始附加？”

伍廷颺既不退步又得耐心地做好说服工作：秩序是不会自然恢复的，要做工作才能使之恢复，建筑公路、架设电话线这两件事，就是促使恢复秩序最有力的工作。老百姓虽然困苦，但还是希望大家再忍耐一阵痛苦，完成这项事业，今后就享福不尽了。正所谓病重了，要下猛药啊！马平县代表提议：“不必附加钱粮，能否用认股的方法较为妥善。”

伍廷颺说：“认股亦须以钱粮为标准，该县附加钱粮可得若干，即须认股若干，并需于指定时间内交集是否有把握？诸君自各地方来，各地情形相当熟悉，何必如此延长时日？总之各县如能筹得到如附加钱粮数目，尽可另筹，否则仍是附加钱粮为妥。”

尽管意见颇多，但经各委员、代表辩论，以及通过算账、讲理、权衡利弊等等，伍廷颺还是说服了各县知事和代表，使之统一了认识，明白筑路及架设电话线是为地方造福、既为自身也垂荫子孙的久远好事。一致感到交通事业极应积极进行筹款举办，向地方筹款，以民众之财，办民众之事，谋民众利益，最合于情理。终使《筹办交通案》经表决顺利通过，决定从 1926

年起，每年按照柳庆各属原有钱粮，加征一倍，作为借款，每年约 30 万元，连借三年，合护商局收入，供建筑柳庆公路及长途电话干线之用。各县知事加征时，制备三联式收据，写明借款若干，加盖县印；4 年之后，此项借款由柳庆公路总局分年偿还。对于征工筑路办法，决定实行包工制，以确保工程的质量和进度。

根据来宾县知事谭鸾翰提议，决定增添柳州至南宁的第五条电话干线。各县城如有干线经过者，仍由政府架设支线连接干线，通达县署。

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多个提案的具体内容：

《整顿柳江各县团务案》—以三个月时间彻底平定柳庆全境。各地团局积极协同军警，追歼流窜于思恩、宜北两县边境的四股土匪，期早日肃清，以靖地方，为建设开创一个安定的良好环境。

《筹设柳江平民工艺厂案》—拟筹设平民工艺厂以增加生产，使平民各习一艺，以谋生计。

《筹拟振兴柳江农业案》—拟设农林试验场，提高柳州农林业的科学技术种植；筹办高级农科中学校，造就农业专门人才；筹设各县市乡农会；筹设柳江农务局。

《柳江各县推行社会教育案》—创办柳江日报、筹建柳江图书馆等等。

70 多年前，广西的地理环境是“北枕五岭，山国荒僻，尤以柳庆洞深水急，交通梗阻，产业不兴，逼处苗瑶绝境。”

而民国十年以来，由于频繁的战乱，百姓流离失所，政权频频更迭，上上下下，人心动荡，那里有安定可言，更谈不上地方建设了。这是当年广西的社会状况，也是伍廷飏立志要改变的。

伍廷飏为了伸张民意，抓实业建设，在久经战乱，百废待举，而财政又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召集柳州各界代表、地方人士、科技人才，群智群策，共同规划柳州各项建设，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与会者深深体会到，伍廷飏从清乡平定匪乱开始，以及往后所要做的事，都是在为地方操劳设想，筹划民生建设，他所提出要办的事，都通过集思广益，汇聚众人的力量一同实施，大家鼓舞兴奋，都寄希望于他的热情宏愿能够早日实现。

村村寨寨筑路忙

柳江各属行政会议结束那天，平时紧锁眉头、显得一脸威严的伍廷颺，终于绽开眉眼，乐呵呵地邀请出席会议的各县知事、人民代表、团董局长们合影留念。端坐在前排的伍总办，外表镇静自若，内彰成竹在胸，使代表们感到有一种压力，一股力量。照完相站起来，伍廷颺留给各县知事一句话：清乡、修路，哪一位仁兄不卖力，就提着乌纱帽来见我。

大政方针已定，有修路任务的县知事们心里明白，伍总办讲话说一不二，回去不抓修路是不行的了。于是，各人一进县衙门，就把各乡乡长、村长召集来开会，把行政会议定下来的大政方针和伍总办的号令一一传达。修公路的指令传到各个村寨，村村寨寨都动起来了。该征工的征工，修好锄头畚箕；该征粮的征粮，备好大秤箩筐。村民有愿意的，有不愿意的，还有骂娘的。怨也罢骂也罢，谁也不敢不去，谁也不敢抗粮。

柳庆公路总局的工程技术人员更加忙碌。盘总工程师于散会后的第四天，就带着测量仪器整装出发，开始测量柳池路柳州至庆远段。

马平县知事一点不敢松懈，立即召开公路沿线各民团区团总、分团总（乡长）会议，分配筑路任务。拉堡、进德等地民工修筑竹鹅塘（张公岭）至五伦屯地段，成团、六道民工修筑五伦屯至六道坳一段；三都、里高民工修筑六道坳至百子坳一段，百朋民工修筑百子坳至忻城大塘一段。

柳池路由柳州经忻城之大塘圩及庆远、河池、南丹以达黔边之六寨圩，即以柳州为中心的辐射公路西横线，全长旧称 900 华里，柳州至庆远段实长 204 华里。鉴于工期短路线长，伍廷颺决定，不能等到测量完毕才动工修路，哪一条路都采取边测量边施工的方式分段陆续兴筑。

1926 年 9 月 25 日，柳庆路段分段全面开工，先后共征得民工 22200 余名，在工地上安营扎寨，实行按村包干办法，分 4 段兴筑：由柳州立鱼峰至三都圩为第一段；三都圩至三拱桥为第二段；三拱桥至蟠龙村为第三段；蟠龙村至庆远为第四段。

全线沿途有石坳 12 个，土坳 4 个，乱石 30 华里，开凿不易；石坳以百子坳、那庶坳工程最为艰难，爆破颇费时日；其中尤以里高附近的百子坳炸石开挖最艰巨，要将 700 米长、40 多米高的石山坳炸开，修筑成宽 6 米以下的路基。路线最大纵坡 14.5%，最小平曲线半径 15 米。后来此工程包给湖南来的师傅开山炸石，一些较大的桥梁也选派能工巧匠制造。土坳以香

炉坳、六坡坳最高，掘土最厚；桥梁以三拱桥及龙桥工程最大，建筑困难。

屋漏偏遭连夜雨。这柳庆路段本来就很难施工，加上连日暴雨，山洪大发，一家伙冲垮了不少的桥梁路基，损失十分惨重。伍廷飏连夜给省政府打电报，火速要求拨款补助 10 万元修复水毁路桥。黄绍竑接电后，立即下令财政在本年度建设预备费项下开支。

柳庆路历经沿线军民近一年的苦战，终于在伍廷飏离任柳庆公路局之时建成通车。

庆远至河池段则于 1927 年 10 月 1 日开始测量，路线实长 176 华里。同月，实行按村包工办法分段接筑。由庆远至怀远为第五段，怀远至土街窿为第六段，土街窿至三江口为第七段，三江口至河池为第八段。

全线以凉水坳最难开凿，填土工程尤巨。特别要提及的是第五段路的修筑并不顺畅。

1928 年 6 月 30 日，柳庆公路总局的报告书中，就催促筑路发了紧急通知，通电负责该工程的郑工程师以及宜山、河池、思恩各县县长，限令在电令到达 10 日内竣工。

以 10 日为限，催得是够紧的了。

到了 7 月 8 日，第六段段长梁世贞呈报说已遵令完工，要求发给路费让民工回家，而第五段却报告说思恩的三千民工不仅未到齐，已经征来的民工还时有逃散现象，形势颇为严峻。这事传到伍廷飏那里，自然十分震惊。

民工缘何逃散，原来事出有因，理论上民工每日可得四角，扣出二角五分的“股份”待工程完工后发给（实际上后来并未兑现）外，实际民工每日只得到一角五分的基本伙食费。如若征集的民工一时蜂拥而来，或是分段不能按时获得上面的拨款，这每天的一角五分钱都无法保证。肩挑手锄，开挖筑路本来就相当艰苦，逢上山石沟壑，劳动强度就要加倍，谁能饿着肚子做工？民工们逃散就是必然的了。伍廷飏一面下令“务须赶紧加调民工，星夜派往。”一面积极筹款下拨，指示“河池民工既由远道而来，自应设法接济伙食，勿任逃散。”并指名要“郑总管妥筹办理。河池余县长设法结束，勿任逃散。”

郑总管亲临工地后，到 7 月底报告说，怀远至河池一段，实在无法于月底完工，要求延期。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此工段的一名叫莫启贤的组长，纠集一些人，状告段长卢贻庭，说他勒扣工钱，讹诈民工，要上司查处他，为此，一批不明真相的民工也纷纷怠工表示抗议，闹得沸沸扬扬的。

伍廷飏立即派人调查，同时又拨发小洋 3 万元给河池路工程用，经查得知伙食费短缺系

因上头拨款未能如期到账之故，与卢貽庭无关。真相大白，倒是莫启贤等人本就消极怠工，反而倒打一耙，恶人先告状。伍廷颺立即批示：卢貽庭并无讹诈勒扣，准免置议。莫启贤等应征之民工工作未及一半，应勒令照补。失去之铁锄等项，勒令照数赔缴，指令河池县长照办。这桩纠葛这才了结。

在伍廷颺的过问下，工程进展渐趋顺利，其中的土街窿填土筑桥颇费时日；谢表岭挖土炸石之工程亦非易事，伍廷颺又加派技士梁荣志协助解决技术问题。

伍廷颺又于 12 月间，亲临路段视查，发现柳庆路附近清潭之桥梁托木已经折断，即指示用木暂时修理以维持交通现状，不须更换托木，待日后计划妥当后，改建砖拱桥，以保长久之用。

至 1928 年 3 月，第五段已能通车；7 月，全线告成，通行无阻。

两线共耗费 90 余万元毫币，其中民工伙食及雇工工资共 31.5 万元，建筑桥梁 23.7 万元，建涵洞 2.4 万元，其它费用 32.2 万元。

1928 年 9 月，随即开始筹划兴筑河池经南丹至黔边六寨圩段，成立丹池公路局，专司筑路事宜，由柳池路总管郑炳铭任丹池公路局局长（次年 1 月由易德馨接任）。该路段由 1929 年 1 月 30 日开始测量，同时征集民工，准备粮食，由于此线段山多人少，征工筹粮均非易事。当时，省政府已派马晓军前往贵州省商洽雇请贵州的民工代筑。是年 5 月，因广西发生政变，丹池公路局解散，事遂中止，直到 1932 年 4 月 1 日，该线才重新开工，1934 年 1 月 20 日建成，在六寨隆重举行通车典礼。此段路前后历时 6 年，算得上是当时广西修路之最了。

1926 年 7 月 15 日，也就是柳江行政会议刚刚闭幕，伍廷颺便收到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的一份加急电报，指令他迅速筹划修筑柳州至宾阳一路，电文指出，柳州至宾阳一路，为本省交通干线，极应修筑，以利交通，伍廷颺应迅速筹划修筑，并要拟出具体办法上报建设厅核准。而马平、来宾、迁江、宾阳各知事，凡是有关筑路的事宜，一切听从伍总办指挥命令。

伍廷颺手持电报，在公路局全体员工大会上发出总动员令，因为这毕竟是柳州衔接南宁的主干道，又是省主席亲自督办，重要性自不待言。

经过密锣紧鼓的筹办，柳宾路于 1926 年 9 月 15 日在大塘至宾阳间同时分开测量，路线实长 215 华里。同年 10 月 1 日起分段陆续兴工。共征得民工 8800 余名，实行按村包干办法，分四段兴筑：由大塘圩至北泗山脚为第一段，北泗山脚至河里圩为第二段，由河里圩至三荐为

第三段，三荐至宾阳县城为第四段。

值得一说的是其中的柳邕路。民国初年，柳邕路是杂草丛生，蛇鼠乱窜的荒僻野地。虽有蜿蜒小路从拉堡通向柳州，但道路难行，土匪经常在这一带抢劫过路人，故来往农民和商贩，总要拉帮结队才敢行走，当时有民谣唱道：“家中缺油盐头痛，雨天变泥人头痛，晴日尘满身头痛，行路怕抢劫头痛。”故民间将这条路呼之为“头痛路”。柳邕路东二巷里还有个地方叫“老虎冲”的山沟，民间传说时有老虎出没，可见当时它是何等荒僻。

修筑柳宾路时间紧任务重，经费紧缺实在难以完成。伍廷颺向省府请示，将柳州所属各县及宾阳 1926 年粮赋，全数拨充柳宾公路经费。省政府于 7 月 28 日批准了他的报告，并饬令各该县按时把粮赋送解伍总办核收。

经费有了保证，柳宾路的建设以飞跃的速度进行：

8 月 15 日，柳庆公路总局在宾阳县、融县开征粮赋加征一倍，以三年为期，作为筑路股本。

9 月 15 日，分段同时测量柳宾路线。10 月 1 日兴工建筑。

1927 年 5 月底，路线路基完全筑成通车。

全线路基工程以夹马坳、石叠坳、北泗山最艰巨；桥梁以龙降桥、勒马桥工程最大。至 1927 年 5 月底全路建成通车。共耗去银 373967 元毫币（民工伙食费 161738 元，雇工工资 37000 元，建桥梁 54895 元，建涵洞 12742 元，其它费用 107592 元）。

这条路的完成，其中的柳邕路段自然不再是“头痛路”，而且由于其战略意义的重要，对日后黄绍竑想迁省会至柳州也起到关键的影响。甚至在柳邕路不远处修建飞机场，及时让抗日战争期间美国“飞虎队”的飞机在柳州起降，都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柳（州）三（江）路自柳州经长安镇至三江，即以柳州为中心的辐射公路北纵线，全长旧称 490 华里，于 1926 年 9 月开始测量，12 月兴工，共征得民工万人，实行按村包干办法，分 4 段兴筑：

由柳州更新亭（今北站路南端）至沙埔圩为第一段；沙埔圩至榕树脚为第二段；由榕树脚至余家村为第三段；余家村至长安镇为第四段。

自各路工程陆续动工之后，伍廷颺马不停蹄地下到各路段去巡视，犹如当年战场上提枪督战的总指挥官。伍总办巡视到融县路段，发现工地上的民工寥寥无几，干活也没有力气，工程

进度十分缓慢。他一怒之下把县知事蒙儒辉召来询问情况。县知事皱着眉头，一脸苦相，战战兢兢地不敢说话。倒是站在一旁的民团局长莫宝珩汇报说，这几年兵灾匪患，人民流离失所，惨状难言，现在还有许多无人居住的荒村，无水耕种的田地，我们下去加征粮赋，老百姓不理解政府的好意，以为是我们不谅解他们的困苦，特意加重他们的负担。征不到粮食又挨骂，实在难堪啊！

蒙知事见伍总办口气不是很硬，趁机凑合了一句：“加征钱粮，只农民负担，商民并无负担，未免不均吧？”

伍廷颺听了二位的陈述后说，农民因修路加重了负担，尤其是河流两岸遭受水灾的农民确有困难。但是，不能因为部分地区受灾，就全县免征钱粮啊！你们要向老百姓解释清楚，修路要用好多的钱，现在政府无款补助，不得不就地筹措，加征钱粮。人民虽然困苦，望再忍困苦，以完成此项事业，将来就幸福无尽了。

离开工地的时候，伍廷颺给马平、柳城、融县的县知事下了一道死命令：柳三路第一段必须在明年8月份通车，第二段必须在10月份完成。接此命令，三县知事谁也不敢怠慢，赶忙派出民团，征调民工，抽收钱粮，各路段的民工这才逐渐多起来。

1927年7月第一段修竣，8月10日正式通车。

经省建设厅派员检查，马平至沙埔一段，长塘坳、古木坳及羊城坳土质多系泥夹石，且山径崎岖，坡度甚高，须挖低10余尺。古木坳坡度约长800余尺，坡度7%，过坳顶路线呈S型。过坳后至第二度旧石拱桥，路线变成90度角，似不宜利用此桥。过沙埔江，江宽160尺。过江后，路基越来越低。至黄家河，建有三拱石桥，面宽24尺，每拱长40尺，工程欠佳。沙埔河槽掘土较多，工程浩大。

柳三路第二段经督促，10月亦告完成。随即命令接筑榕树脚至长安镇一线。于1927年12月1日兴工赶筑，共征得民工13800余名，实行按村包干办法，分两段兴筑。后因第四段之三千江桥工程浩大，款额支绌，未能架设，至1928年9月仅能通车至浮石圩。

其间，发生过一起因大良局董莫尤阻止柳三路技师李大新住宿的事件，传到伍廷颺处，伍廷颺下令要融县知事查明究治，并责令该县团防，遇有筑路工程人员，须妥为保护，如有意外发生，即拿各该局董是问。

为解决三千江桥难题，伍廷颺即以建设厅的名义下令：“自10月1日起，各技术员出发

工作，每日津贴一元，监工员津贴三角。”经技术人员现场调查后修改计划，在三千江桥两岸开辟码头，就原日水坝敷设水泥架桥，暂作车路。经过一个月抢修，终于 10 月通车至长安。柳长段共耗银 26.6 万元毫币（民工伙食费 10 万元，雇工工资 3 万元，建桥梁 73084 元，建涵洞、开山石共 36320 元，其它费用 26596 元）。由长安至三江段，因种种原因，原计划终未能实现。

柳三路通车后，还发生过一些地方无赖不怀好意，在扼要处堆积木石，企图阻碍行车的情况。伍廷颺立即下令，要该处附近的民团，派人保护行车。那些无赖见无机可乘，也就不敢轻举妄动。

柳湟路自石龙圩对河之良村起，经武宣至桂平之大湟江口止，即以柳州为中心的辐射公路东纵线，全长 280 华里（旧称）。于 1927 年 1 月开始测量，同年 2 月起分段兴筑。共征得民工 4700 人，实行按村包干办法，分两段动工：由良村至黄茆为第一段，黄茆至武宣县城为第二段。因民工过少，故集中先筑第一段，7 月再修第二段。该线地势平坦，除据村河、崩桥河须建筑大工程之桥梁外，路基较易施工。但由于上述两桥工程浩大，材料运输困难，直至第二年 7 月中旬始建成通车。共耗银 13 万元毫币（民工伙食费 35800 元，建桥梁 65250 元，建涵洞 2110 元，其它费用 35840 元）。此线通车不久即营业不佳，原因旅客及货物在石龙过渡，加上武宣至大湟江口段未通，车辆多不愿前往，遂至无车行驶。1929 年 4 月 1 日，武宣至大湟江口段开始测量。不久，广西政局发生变化，测量队解散，事遂中止。



柳荔公路三江改路竣工
寒湾村桥（1928年竣工）

柳榴路自柳州至榴江县属之石人冲，与修（仁）荔（浦）路衔接，即以柳州为中心的辐射公路东横线，全长旧称 180 华里。于 1927 年 9 月 8 日开始测量，路线实长 155 华里。同年 11 月 1 日于鹿寨圩设立柳榴公路局专司筑路事宜，仍由柳庆公路局监督指挥。11 月 15 日开始动工，共征得民工 20280 名，实行按村包干办法，分三段修筑：由柳州立鱼峰至雒容县城为第一段，雒

容县城至思立村为第二段，思立村至石人冲为第三段。



柳州公路民工正在筑路(1927年摄)

柳榴路全线工程较难处为：十二弯辟岭开路长达 2000 尺；茶山挖低坡度高 22 尺，长 140 尺。此外，尚有脚板洲及瓦窑两处原定架设桥梁，后因水阻，暂辟码头，以舟济车。

因为实行了包工制，一些石匠、工头都分别与路局画押签约，那些按时按质完成的，自然皆大欢喜，如大湖桥包工头何愈久虽未完工，但工值未有亏欠，路局另招工完成，何愈久

得以开释。一些消极怠工者，却也着实尝到苦头：如石工周盛昌逾期不能完工被拘留，他后来愿缴罚金 1000 元，取保开释。还有料望桥包工头方全等人，工未告竣，畏难潜逃，被擒获押送雒容县署，这项工程后另雇工匠筑成，但超出原价 1400 多元。方全等人因而被拘禁数月。

柳榴路共耗费银 324000 元毫币，其中民工伙食 10 万元，雇工工资 1 万元，建桥梁 110314 元，建涵洞 27550 元，其它费用 76136 元。

筑路工程艰难，经费短缺，施工手段落后，民工和乡民对筑路的认识还有差距等等，这些都制约着筑路工程的进展。

伍廷飏不仅仅只有强硬的手段，对于那些表现好的人员，他也不乏褒奖和鼓励。如马平分局委用筑路的各段长、督工员施工得力，县长陆希澄拟特制金色奖章 12 枚，银质奖章 15 枚，填备证书发给这些得力人员，此呈得到了伍廷飏的首肯。这在当时，应是十分荣耀光彩的事了！

从 1925 年 9 月动工修筑第一条公路，至伍廷飏奉命调任广西省建设厅厅长，他在柳州亲手规划、组织、督战的公路建设，被有关人士称为全省之冠，其中柳石路、柳宾路、柳庆路以及柳三路之柳州至融县榕树脚一段，均已先后通车。柳湟路线已测量完毕，其中良村至武宣段已开工兴筑；柳池路宜山至河池段，已经总管郑炳铭踏勘完竣。

按照 1926 年的决议案，柳州通往东南西北的四条纵横干线，虽未全部通车，但以柳州为中心的交通枢纽主骨架已基本构成。

柳州总车站



建筑中的柳州总车站（1927年摄）

随着各地公路相继建成通车，一些地方人士也以经营汽车运输为一项有利可图的新事业，纷纷集资购车，创办汽车公司，开办运输业务。而官办运输经营欠佳，获利甚微，阻滞了公路运输的发展达不到修筑公路的预期效果。识时务的伍廷飏力主公路运输以商营为主，经省政府批准，于1928年4月先后公布了《广西建设厅特许人民汽车运

载客货行驶公路暂行章程》等规定，鼓励私人购车和租车，从事运输经营。此举迅见成效，全省数月内成立汽车公司25家，当年进口汽车237辆。

公路运输蓬勃发展，而为运输服务的汽车站、修车厂、加油站等一系列配套的交通基础设施，也就相应地投入建设。1926年9月柳石路通车时，即设立柳州、穿山、石龙三个汽车站。随后通车的各条公路均先后设置车站或分站。初时，站房多属因陋就简，借用民房和庙宇，稍作修整即暂作办公场所。

柳州车站为柳江区中心，是柳迁、柳庆、柳石、柳长、柳池等5路之总站，各路客货运输集中，站务繁忙。早在1927年5月，伍廷飏还在柳庆公路局任总办的时候，就决定在柳州建一座“宏伟、华丽、堂皇、气派”的具有西式风格的总车站，以适应日益扩大的运输业务。他亲自勘查地址，最后确定在立鱼峰南麓动工建筑。伍廷飏选定于此，是有他考虑的，一是因此处位于柳州“南大门”，距市区不远，地势平坦，利于发展；二因其恰好是柳州通往各地公路线的起点，既方便行旅，又适于监督指挥，他于是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地方。

为此，柳庆公路总局几经磋商，从一位名叫梁树华的手里买下这块地皮，又聘请德国工程

技术人员设计，还派了专人到上海请来一家营造厂承建，用的是从德国进口的“红毛泥”（水泥）。为建设这个车站，使之达到“宏伟、华丽、堂皇、够气派”，伍廷飏的确是煞费苦心，就连车站周围的明渠，他也亲自批文派技术人员进行测量施工。伍廷飏调任厅长之后，为确保柳州总车站的建设，专设建筑柳州总车站办事处，直属建设厅领导，直到车站落成，才交柳江区公路管理局接收。

待车站全部工程完成验收之后，伍又根据呈报，批示提升在建设总车站“服务勤劳”的技术人员，将技术员朱槐科，监工员秦建勋、吴熹等提升为9级技术员。这在当时，是一种破格提拔了。

新建的总车站大门面向柳邕路，左侧面向鱼峰山，是一座二层砖木结构，西南部转角处矗立四层方形钟楼的西式建筑。东西长22.6米，南北宽22.7米。房屋式样新颖，设备先进，装饰豪华，两层共16间房（主楼四层四间），占地面积约600平方米，使用面积900多平方米，楼后还建有停车场和车库。车站和厂房耗资94865.30元，占柳庆公路总局支出总数的15%。

1928年10月，柳州总车站落成，省建设厅在站前广场举行了十分隆重的落成仪式，各界名流到场，车站周边的老百姓蜂拥而来。更饱人眼球的是，入夜之后，车站那新装的40多盏电灯大放光明，辉煌壮观，开了柳江南岸使用电灯的先河，让柳州人对现代化交通、现代化电能为之耳目一新。

新车站不仅是柳州而且还是广西当时首屈一指的西式建筑物，柳庆公路总局和柳州总车站办公室都设于此，这两个机构，均为省属单位。莫伦为柳州车站第一任站长。柳州总车站除负责管理上述各线的行车事务外，同时还负责管理柳石线之石龙站，柳宾线之大塘站，柳庆线之庆远、怀远、河池站，柳榴线之鹿寨、榴江站，柳长线之太平、长安站，是桂中地区著名的车站。

更让伍廷飏喜出望外的是，柳州总车站不仅成为柳州的标志性建筑，还成为广西的门面和骄傲。皆因其所处位置极佳，风景秀丽、又有古洞石刻的鱼峰山近在咫尺，加之通往东南西北的道路已修筑完毕，此处有一座外观雅致、室内装饰豪华的西式楼房，不啻成为省内外达官贵人瞩目的对象。至于来柳公干的政要和嘉宾，也随当局指引前来参观探访。一来二去，总车站声名大振。当局索性在车站二楼布置一番，临时用以接待。

于是，从1928年起，该楼便陆续接待了不少名流：

1928年冬，从广州来柳指导筹建物产展览会的专家方鉴泉、李庆辉；

1929年1月来柳参加广西省首次建设会议的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代表陈国机、贵州省政府代表黄乾堃，著名专家丁文江、李四光、邹秉文、莫定森、赵俊声、辛树帜、凌鸿勋、潘应霖以及新加坡华侨代表伍玉山、南洋实业团代表周瀛海、吉隆坡广西会馆代表周辉浦、吉隆坡华侨协进会代表陈新亚等15人；

1930年以后，先后接待了第三路军总司令张发奎、日本驻华总领事须莫弥吉郎、国民党中央委员伍梯云、美国驻粤总领事巴伦丹夫妇和德国驻粤总领事华根纳夫妇、加拿大中国学院院长江亢虎及英国参赞柏士德等等。

应该说，柳州总车站是辉煌一时了，而这正是伍廷飏当初所追求的。

有趣的是，到了1935年7月，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坚持割据，积极反蒋，在南宁成立乐群社，以和“老蒋”在南京的“励志社”唱对台戏。广西各地立即也相继成立10个分社。柳州乐群社社址被当局定在这座小洋楼里，既然是广西最高当局征用，公路总局只好让出，搬迁到鱼峰路北段的一栋普通的楼房里办公，这大概是伍廷飏根本没想到的。



柳州总车站全景(1928年摄)

柳江农林试验场

1926年初夏，距柳州城约10里许的羊角山麓，瘴雾迷漫，獠扰猴号，百鸟啁啾。

一列士兵队伍从柳石路方向走过来，走在前面的两匹高头大马，蹄声得得。一位威武的军人骑在马上，腰间挎一把长柄战刀，他就是柳庆清乡总办、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五旅旅长伍廷颺。另一匹马更让伍廷颺想不到的是，1938年10月，他当年设计的柳州总车站，竟然会成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柳州的主要活动场所，此后，这栋盛极一时的楼房，不断改变其用途，先后进驻行政院广西救济分署储运组、柳江县政府、陆军医院、兵站等单位。

尽管后来历经战乱和80年岁月的沧桑，如今这栋建筑的内外在经过修缮后，已成为柳州市的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起来，即便在高楼林立的鱼峰山下，它那别具一格的造型，仍然会使人想起它当时的辉煌！

上坐着一位戴眼镜的书生，身着长衫，神色略显不安，也许是他不习惯骑马的缘故。这位书生便是刚从北京来的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杨士钊。

队伍开进山口不远，一道荆棘挡住去路，再往前走就更难走了。伍廷颺从马背上跳下来，命令士兵用刺刀拨开荆棘草莽，用锄头填平沟沟坎坎，顺着山势开出一条崎岖小路来。

沿着坎坷的山道，伍廷颺与杨士钊一面察看沿途的水土林木，一面聊天。伍廷颺说：“蒙杨先生乐于投身我广西南蛮之地，参与建设柳江，私心非常荣幸，柳江人民也无任欢迎。”

伍廷颺这番客气话，并未引起对方的反应。他回转头来，发现杨士钊并未跟上来，而是蹲在地上，手捏一把混土，凝视良久。

“展公，我们踏勘了好几个地方，此处最佳！这里水源充足，土质优良，山深林茂，气候适宜，正是农林试验研究的好地方。此处叫什么地名？”杨士钊朝迎面走来的伍廷颺问。

“前面有个龙潭，很大，所以，乡人称此处为大龙潭。”俩人站在碧波幽幽的大龙潭畔，由远而近地聊起来。

“杨先生，当今欧美各国求发展，都事先开办学校和试验场。我柳庆地方纵横不下千里，川源流贯，山脉蜿蜒，如今战乱已平，民情思治，正是发展农业的大好时机。此次邀请先生来柳，亦为图谋科学实验，在我柳庆推广良种良法之先进技术，振兴柳江农业。”

“展公，办学校办科学实验，要先建实验场，购买仪器、设备、书刊，去学习考察等等，

得先花一大笔钱啊！较之外省，柳庆地区略为贫困。恕我直言，这办场资金、试验经费，展公你何以筹划？”

“杨先生你勿用多虑，我从柳江各属屠牛捐收入项下，拨出十分之三成来充作办场经费，应当不成问题。先生只管草拟农业改良方案，农业方面注重育种及栽培，林业方面注重育苗及造林。待下个月召开柳江各属行政会议，提交大会讨论决定。”

1926年7月1日至11日，柳江各属行政会议在柳州召开，杨士钊以柳江农林试验场筹备处主任的身份出席会议。主持会议的伍廷颺，在第一天的会议报告中，就把农业改良、开办农林试验场的问题，向各位代表提出来，希望代表们加以讨论，决议施行。

经过11天的认真讨论，大会代表一致通过了“筹拟柳江农业案”。此提案由雒容县知事龙明誉、象县知事区柏年提议，杨士钊主任附议。

提案把振兴柳江农业分四步走：

第一步先办柳江农林试验场，场址设在柳州对河大龙潭，开办费及常经费从屠牛捐收入中拨充。

第二步在柳江农林试验场内筹设一所高级农科中学校，造就农业专门学术人才，研究解决柳江农民一切困难问题，以图农业之推广改良。该校可同时借用柳江农业试验场的教员及仪器设备，学生亦在该校实验实习。该校教学科目以柳江目前最急需者，如农林、垦务、蚕桑、畜牧等，其余专科待学校经费充足时再先后开课。

第三步筹设各县、市、乡农会，以图农事之改良发达，各级农会必须向农民灌输改良技术知识。

第四步筹设柳江农务局，统理柳江农业，使柳江各属改良农业有系统地进行，并得以充分发展。

柳江各属行政会议结束之后，杨士钊全力以赴地投入柳江农林试验场的筹办工作。

1926年9月，柳江农林试验场正式宣告成立，山林水域占地面积3333.33公顷。这是柳州最早的农业科学研究机构。

该场场址位于柳州西南羊角山大龙潭，紧靠柳石公路，距城10里，距鸡喇柳江河边约3里，水陆交通比较便利。

伍廷颺任命杨士钊为柳江农林试验场第一任场长。

杨士钊带领职员砍树割草，搭盖简陋的茅舍，把实验仪器搬进去，便开始了初步的化验研究。伍廷颺派出 10 名武装士兵进驻农林试验场，既保护农试场不受匪徒坏人的侵害，又协助农试场开垦建设。

柳江农林试验场最先开垦试验、经营的地段是莲花山、观音岩、大龙潭、新坡凹、立竹峰、鸡窝垌、羊角山。随着技术人员的补充和不断招耕，耕垦面积也不断地扩大。

柳江农林试验场留给后人保存至今的佳景，便是如诗如画的大龙潭湖堤了。

他们将大龙潭附近的数十亩水田洼地划出来，用石块筑堤造湖。至 1927 年 10 月合并改为广西实业院时，湖堤的基础已砌到一半，湖堤的大闸及北边的小闸口都已修好。实业院接管后，仍然依照柳江农林试验场的原计划砌完全堤，并添筑南边小闸，以备冬旱水低时启用。后来又在湖堤北端开辟山石，筑道一条，成为绕湖的北岸。湖水与大龙潭相通，既能灌溉农田，又可养鱼划船。次年春季，又沿着湖岸遍植柳树松树，把大龙潭湖堤点缀得非常的美丽壮观。

1927 年 10 月，柳江农林试验场统归广西实业院。据柳江农林试验场报告，场内有水田旱地 3757 亩。后经实业院重新测量，实为 3988 亩。另有占地一二百亩的道路、房屋建筑及部分农业科研试验仪器设施等。

柳江公医院

对于广西的雾气宜导致疾病，柳宗元用“桂岭瘴来云似墨”来形容它的可惧与神秘。而柳州，在内乱频仍的年代，更是疾病横行，民不聊生，据史载：从清同治三年（1864 年）至 1919 年的 55 年间，柳州一共发生了 6 次大的瘟疫，多是像鼠疫、霍乱、天花等烈性传染病，每次瘟疫流行，死亡少则数百，动辄上千，仅 1901 年夏天那次霍乱症流行，“五六天内死千人”，可谓十室九空，谈疫色变！

1913 年，日本人吉田博爱第一次把西医传入柳州，但当时群众普遍只信中医，信西医的极少。而当时中医诊金昂贵，一次收诊金 2 角（银毫），而西医连诊带药才要 2 角，尽管如此，病人还是不求西医不信西药，甚至西医施行赠药，病人还是不敢用西药，因此西医迟迟得不到发展。直到 1925 年，柳州仍然仅有几家私人药铺（房），和外来开业的两位西医生。

作为地方最高长官的伍廷颺，自然责无旁贷地要面对疾病挑战和市民缺医少药的情况，以及战争造成的伤残。更何况战事不歇，除了曾与粤、黔、滇等的军阀混战之外，兵、民在清乡剿匪中也常少不了受伤挂彩的，故无论于军事、于民生和一方百姓的生活健康，都很有必要创办一所地方医院。

1926年2月间，春节过后的一个晚上，伍廷颺带了勤务兵，信步来到东门街，专程拜访“高公馆”的主人。这座在柳州响当当的“少将第”是一色的水磨砖墙，粉饰精工，布置陈设华丽大方，客厅花园构筑得体，为当时柳州屈指可数的豪宅。而府宅的主人高景纯，曾经显赫一时，在柳州颇具影响。

高本名成忠，景纯是他的字，福建人，1875年生，清末在军中任管带，入民国后升任统领，获少将军衔。后入将校讲习所学习，仍在桂军中任统领。先后任广东督军署少将卫戍司令、护国军第三司令，驻柳州。1921年军阀蜂起，高将两营兵分与别人，从此退隐在家。1921年至1922年，滇军两度入柳，高景纯将家属避居香港，他独留柳州，并将家宅让市民妇孺作避难所，成立妇孺救济会，救济妇老病残。后成立团防，众人公推高景纯为团局总团长，有长短自卫枪，使民众稍安。1922年10月，陆荣廷手下的师长韩彩凤驻军城内，沈鸿英驻军城外两军交火。高不顾个人安危，出城与双方交涉，留在沈军中作人质，结果双方停火，韩军撤出柳州，避免一次生灵涂炭。事后，全城商民刻制了一面“维桑与梓”金字大匾，悬挂高宅，以表谢意。

高既是柳州的名流士绅，论年纪与资历都比伍廷颺要长，自然获得伍廷颺的尊重与信任，加以高热心公益事业，伍廷颺觉得有必要借重他的影响。

寒暄过后，伍廷颺开门见山地说：“实不相瞒，今晚廷颺登门拜访，是为在柳州办一座西医院事，向高司令讨教。”

高景纯呵呵一笑说：“伍总办过谦了，总办上任后为柳州做了那么多好事，民众们有目共睹啊！有用得着高某的地方，一定尽力！”

“那廷颺就不客气了……”伍廷颺于是把办医院的理由及设想一一道来，并说，已下令先行委托陆军野战病院金华昆院长作业务上的筹备，然后说：“高司令德高望重，热心桑梓，廷颺想借重司令的威望，一呼百应，在办院地点和经费筹措上，取得绅商名流们的支持。”

高景纯刚过50岁，身健心宽，几十年军旅生涯养成了爽朗性格，他一摆手说：“要高某带头，捐钱捐物……不成问题！只是……医院的地址选定了没有？”

伍廷颺说：“廷颺几经查勘，觉得有一处地方最为适宜！”

“哪里？”

“天后宫庙宇。”

“啊！”高景纯吃了一惊，“这……合适吗？”

伍廷颺这才说：“这正是廷颺最感为难的地方。一定请高司令支持！”

高景纯沉吟半晌，这才说：“天后庙距此不远，交通方便，房舍高大宽敞，伍总办的确有眼光！只怕是……众多的船民和善男信女有抵触呀！”

“廷颺对此已有考虑，年前省府黄主席并白崇禧参谋长，已发起破除迷信、拆卸庙宇的通令，除孔庙、关帝庙、岳飞庙之外，其余不得保留！拆天后庙是师出有名，只要将通令向民众宣讲清楚，谅想无事，所虑者，为商绅名流，他们要是不予大力支持，仅靠上面用税收所得拨给是有限的，医院也难得长久维持。”

高景纯点头说：“那好，邀集开会那天，高某一定支持伍总办，你放心了！”

伍廷颺这才称谢之后离去。

说起这天后宫，倒还有些来历。它原称天妃庙，坐落在今天东台路东端临江处，是柳州著名大庙。前临柳江，遥对灯台山，建筑古朴典雅，高明闳丽，颇具规模。大门有副名联：“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水长长长长长长长消。”引人费一番琢磨。

天后宫内古木参天，林荫蔽地，花木芬芳，景致幽雅。中殿是尊天后雕像，高约3米，旁列宫女塑像8尊，高近2米，俱为彩像，俊秀庄严。闽、粤等省称天妃为妈祖，是沿海地区供奉的海神。柳州有不少来自闽、粤的移民，据说修建之初捐献最多的也系祖籍为闽南的柯苗子族中人。

说到柯苗子，又传有一个故事：相传柯苗子的父亲是个老好人，但非仕绅，也不富有，实属默默无闻的小康人家，却忠厚诚实，乐于助人，而且一丝不苟，因此过往客商多乐与结交。柳州是柳江上游产木地区的木材集散地，木材既多又好，这些木材的持有人，多是定居柳江上游广大林区中的苗族山胞。他们将原木运到柳州后，或就地出售，或改装结构后继续顺流而下，都得在柳州逗留一段时间。苗胞们背乡离井，总想结交一些朋友获得照顾的方便，柯苗子的父亲正是他们结交的好对象，其家自然成了他们照顾病患、寄存财物之处。其中有一个是寄存财物较多的苗胞与柯翁的关系又特别好，但他已运木东下，历久未归，探问其他苗胞，此苗子也

没有别的亲人，亦未得其消息，一去竟杳如黄鹤。柯翁因担心其发生意外，以致日夜思念，有一天正独坐厅中，忽见寄存财物的苗友从容含笑而来，遂欢呼：“苗子，怎么耽误这么久没回！”话刚说完人就不见了，正感奇怪时，家人告诉说，夫人快要生产了，不久果然生了个男儿。柯翁认为此苗子已死，其魂魄是来收帐的，就将儿子取名为苗子，也算是对朋友的一个纪念。

此后，柯翁就将这苗友留下的钱财为本金做生意，不仅乐善好施，而且对苗胞尤其关怀备至，遇有病痛困难者，必予妥善济助，于是和更多的木商山胞建立深厚交情，生意也越来越大，财源滚进。到了柯苗子长大成人，来柳州的苗胞，都以为柯苗子是同族人。更是与其相近，柯苗子愈富，愈得苗胞信爱，木材生意越是兴旺，逐渐成为木商的中心人物，富甲一方，但其生活依然俭朴如前，济贫救灾，架桥铺路的事却舍得大掏腰包，所以很有口碑。到了后人修建妈祖庙时，他的族人自是慷慨解囊了。这一传说虽有点迷信色彩，但也反映出当时柳州汉苗民族的亲切关系，以及人们对天后宫的重视。

清代以前，柳州称此庙为天妃庙，明代著名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游柳时就一直借宿天妃庙，在其《粤西游记》中有所记载。天妃庙曾经屡坍屡修。清代捐资重修后改称天后宫。旧时，过往船只航经庙前时，皆来庙内焚香点烛，鸣炮叩拜，祈求航行平安。因而一年四季来庙进香求神许愿者从不间断，香火颇盛。尤其是每逢农历三月二十二日妈祖诞期，庙会更是盛况空前，抬神像出游，行遍市区，整个柳州城热闹非凡。

这日，伍廷飏邀集柳州当地的绅商名流，共同议定创办柳江公医院事宜，他这倡议一出，得到众人的拥护。但一提到拆除天后宫神像，便招来一些人的强烈反对，尤其是柯姓的两位商绅，他们说，这天后是世代相传的神灵，造福子孙，怎能毁掉！为此引起了激烈争论。

正在相持不下，高景纯说：“我祖籍福建，福建人崇拜妈祖，由来已久。要说拆神像，我高某人情感上也想不通。但是，高某走南闯北，军旅生涯三十余年，所见所闻，什么事还是得靠我们自己来做！乱红头（滇军入桂）时，韩彩凤、沈鸿英开火时，侵扰柳州，神灵何曾又护佑过各位呢？还不是我们自己设法解脱吗！如今伍总办要建医院，这是造福地方的实事、好事！我们怎么要舍弃看得见的实事不做，而去求那虚无飘渺的神灵呢！再说，拆庙是省府指令，伍总办这一倡议，还是破旧立新，造福桑梓，意在民生之举，我等不应当支持吗！”

这番话说得反对者哑口无言。

伍廷飏接着说：“‘民十’以来，地方初定，百业待举，反对封建，破除迷信，革命者责

无旁贷！再说，军令政令，令出如山，廷颺身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省政府有通令要拆庙，不是谁想得通想不通的事啊！廷颺考虑，与其拆庙毁像，一扫而光，不若留下庙宇房舍办成公医院。中医也讲悬壶济世嘛，那由政府出面公办的医院，就更是为一方百姓救死扶伤的！若是真有佛神的话，我们这么做，也没有违背普渡众生的本意呀！诸位都是有识之士、地方贤达，应当支持廷颺，教化民众，一同热心来办好这个事业。”

伍廷颺一席话，中肯坦诚，合情合理，加上高景纯事前也和几名有头面的商绅打过招呼，同声附合，众商绅也纷纷表示支持伍总办的主张。

在伍廷颺提议下，经费来源一是由地方绅商捐款，二是从税收（主要是屠牛捐）中拨给。委托陆军野战病院金华昆院长作业务上的筹备，后因金院长奉调桂林，继而委任余德生医生为柳江公医院筹备处主任，会同第五旅部副官谢佩西筹商进行。院址定在东门外天后宫。

此后，一场由白崇禧始作俑者，经黄绍竑通令全省，掀起破除迷信的“打神风”迅速蔓延，除孔庙、关庙、岳庙之外一律不准保存，柳州各寺庙神像先后被捣毁，一些民众早听说伍廷颺要拆天后宫办公医院，即将天后宫中的神像偷移藏匿，但庙宇已空。

柳江公医院终在1926年3月成立。这是柳州有史以来的第一座西医院，占地面积约为1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占四分之一，其中有二层楼房一座位于医院中心，上下各四房，上为医生、护士长宿舍；下为药房及诊室（占三间房）。楼房后面平房一座为病房，可容纳10名病员；左边一座平房为手术室；右面平房一座为护士班教室。楼房前面有两幢平房，左为护理员及职员宿舍；右为单人病房，约16张床位。另有伙房及太平房各一座。后来在右侧距楼房40米处兴建泥墙平房作门诊室。

医院成立前，伍廷颺用高薪从广州聘来首批医务人员三人：女医师彭瑞萍，广州夏葛医学院毕业；护士长关黛梅，广州端拿护士学校毕业；调剂员姚贤安，广州浸会医院调来。医生薪水低者每月东毫80元，高者100元不等。许多贵重药品也从广州购办回柳施用。

创办之初，伍廷颺在经费上也给予极大的支持，除了应付的屠牛捐外，当年，即从柳庆公路总局支付给医院40956.715元作补助费。当时医院无院长，除护士长外亦无其他护理人员。当年自办护士班，参加培训人员由医院挑选，每期6至7人不等，边学习边工作，其中有3个月试用期，如不称职予以辞退，学习费用自负。护士班待遇：伙食费由医院每月供给15元东毫，还发给津贴。毕业考试合格后留在医院做护士，每月东毫21元。

服务对象是军队士兵、上层人物及贫民百姓。

由于医院规模小，医务人员十分缺乏，再加上当时人们对西医西药不了解，有病仍靠中医中药治疗，因此业务上只能开展普通治病的诊治工作。如：外科中的小伤、疮癤以及正常的产妇产分娩等，门诊量每日数十人。

此后不久，为加强医院的建设，伍廷颺又从广州请来李季温医生（法国人办的韬美医校毕业），黄少农医生（广州光华医校毕业），王虎粹医生（北大毕业，搞外科专业）等。

1927年张剑青、王虎粹离职他去。1928年从广州聘来王荣、尹纪彭、姚若炯等，均为广东公医学校毕业。王荣任第二任院长兼外科主任。此时外科能开展一般的小手术，并有显微镜一台及少量仪器和染料试剂。

王荣任院长期间，在门诊后面添建一座两层楼房，供当年成立的医院董事会使用，董事会管理医院的建设，高景纯为董事长。

从创办公医院起，高景纯就热心捐资与张罗，故伍廷颺极力扶持他担任董事长也就再正常不过了。柳州大火后扩建马路，高被公推为柳州建设委员会主任。柳州成立红十字会，他又被推为会长，平常亦备药施赠百姓，是一位勇于为市民谋事、乐善好施的名流。



柳州公医院外景（1935年摄）

1928年10月，柳州发生大火灾，死伤者甚多，柳江公医院收容10名烧伤面积达40%的患者，在当时设备及医疗条件极差的情况下，经协力治疗幸未有一例感染死亡，全都痊愈出院。事实胜于雄辩，这一来，西医在柳州人的心目中，开始有了新的认识。

从1928年11月13日柳江公医院一周的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上门接受求诊治疗的人越来越多：门诊赠医赠药145人，赠防疫针43人，特诊69人，急诊1人，外诊5人，打防疫针3人，住院留医29人，医治传染病1人。第二周留医住院增至73人。

公医院的的成绩，逐渐为人们所认知与肯定，相信西医、西药的人也越来越多。1929年，全院医务人员已有十余人，设内科、外科、妇产科，特聘司药陈智新为广东省公医院附设调剂班毕业生，护士长为尹纪彭。1929年1月，医院发展后又设立了宜山分院（后改为宜山公医院），姚若炯任分院长。

1931年，一桩公案将董事长高景纯扯上省民政厅，把他和伍廷颺纠缠在一起。事件的始末是这样的：柳城县民团副司令孔人峰等人，报告请求免交给柳江公医院的屠牛捐款，以便将这笔款用于民团学习、训练的经费。而柳城县地方财政局，竟也发电报，声明不派出代表参加公医院的董事会，不解送屠牛捐款给公医院。

高景纯作为柳江公医院第三届常务主任（从第一届起，高一直连任董事长），眼看董事会召开在即，而柳城县带头发难，引起各县踟蹰观望，他也立即报呈省民政厅，要求严令各县照案解缴屠牛捐，以维持公医院的正常工作。

而柳城县拒解缴牛捐的理由有三：一是说前总办伍廷颺强迫提拨屠牛捐；二是说柳江公医院较私立医院收费多；三是说各县距公医院远近不一，病者就医困难。

对以上各点，民政厅在裁决给予批驳，说是自1921年以后，柳庆各县因为连年地方变乱，耕牛稀少，一律禁止宰耕牛，当无牛捐可言。1925年，省局指定伍廷颺旅长驻防柳庆，到1926年地方秩序逐渐恢复正常，伍为筹办平民工厂及柳江公医院，呈文上报，经省政府批准开禁，允许屠牛，是因为用收取屠牛的捐税作为筹办地方公益事业费用的来源，与直接提拨各县税款不可同日而语。之后，平民工厂有省里拨给的专款补助，后经柳江第二次行政会议议决，将全数屠牛捐款拨为柳江公医院经费，呈报省政府核准在案。当时各县均有代表参加，更是足以证明：柳江公医院是由伍廷颺倡办于前，政府及各县亦赞助于后，1930年间，象县、融县数县曾有截留半数的屠牛捐归地方的提议，但经过广西总司令部批复，仍然坚持按照原来案维持，所以，屠牛捐为柳江公医院的专款，已成为牢不可破的铁案，柳城县财政局说伍廷颺强提地方牛捐，纯属无理取闹！

其次，按公立医院的惯例，凡到院诊病者，都要挂号以区别先后而便于统计。

柳江公医院只收挂号费铜元四枚，似不为多。药费一概赠给，至于住院病人虽然分等酌收药费，但对确实贫困难缴费者也临时豁免。经调查，省内外各公立医院还未有完全不收费用的。柳州公医院用为数不多的牛捐为经费，不可能例外做到完全免费，否则不但医院难望发展，而

且有款尽倒闭的危险。从开办以来到现在已经六年了，虽然在设备上不能尽于理想所期望的那样完善和及时更新，但每月治疗人数都在 2000 名以上。使地方人民感到便利，即使对于历年伤兵的治疗，柳江公医院亦尽力不少，人们评论者说伍廷颺在柳州的种种建设，以柳江公医院为最有成绩，绝非空话。柳城县财政局方面如认为院中办理有未尽善之处，尽可派遣代表提议改善，为什么不调查事实而信口雌黄呢！

总之，该局欲推翻成案，截留牛捐，是不明白“民有民享”真正意义，所以才眼光短浅，胸襟狭隘，不惜捏造事实颠倒是非，欲将办得很有成效的公益事业摧残破坏之以为快，实有负宪法里规定加强地方建设之至意。至于该局发来的电报污蔑董事一节，已经由董事会的复电声辩明白，合情合理。现在，严令柳庆各县照案解缴屠牛捐款，以资维持，以免使已经建成的公益事业遭到损害！

以上的批驳，有理有据，柳城县财政局无话可说。

这桩公案闹得沸沸扬扬，引起世人极大关注。最终自然是柳江公医院获胜，各县依铁案解缴屠牛捐款。如此一来，却也加深了民众对柳江公医院的认识和对伍廷颺倡办该院初衷的理解。

柳江日报

新桂系主政广西，乱后初治，绥靖清乡仍在进行，需要靠办报纸在宣传舆论上采取主动，以收“一纸胜过十万毛瑟”之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伍廷颺于 1926 年 6 月，积极筹备办报。这是他重视修路、架线、垦殖等实业建设的同时，对文化宣传也不放松的具体举措。

说到报纸，广西是相当落后的，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广仁报》创刊于桂林，那是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在广西的维新派，为寻找救国道路造舆论而创办的政治报刊。曾经就读于桂林陆军小学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伍廷颺等辈，不一定能看过这每月出两期，开办后两年即停刊的报纸，但身处当时的桂林，不可能不听说过《广仁报》，或它在广西的影响。

伍廷颺是个勇于进取的实干家，深知舆论宣传的重大作用，他调拨专款，抽派人员，远赴广州、香港，采购印刷机器及有关设备。又亲自出马选勘地点，挑选人才。经过一番努力，社址设在东门街（今罗池路）原广西银行柳州兑换处内。内分评议、出版、考察三个部。印机、

字粒、纸张、油墨等已于6月20日由梧州运到。

柳江日报创办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广西省党部都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伍廷颺聘请国民党省立柳州四中区分部负责人、教师、中共柳州支部宣传干事罗琴谱、中共柳州支部书记陈岳秀等，参加筹备出版柳江日报，并分别兼任编辑和评述员。而柳江日报的发刊词，就是由罗琴谱起草的。

在罗、陈的影响下，柳江日报积极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宣传国共合作，动员民众开展国民革命，支援北伐战争，报道工农、学生运动，在当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1926年7月，在柳江行政会议上，伍廷颺就推出了《柳江各县推行社会教育案》，该文提出要推行社会教育的原因，认为柳庆各地，在遭受到连年混乱之后，教育缺乏，文化落后，如今建设伊始，谋求教育的普及，就成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大凡社会建设事业，没有不依赖民力共同取得进步的。如果教育不能普及，民众的智慧不能开启，那民众爱国爱乡爱身的道理也不能明了，个人与社会之关系利害也是分辨不清的。各项事业，最难的就在开始，虽然有好的办法与举措，也不容易进行。现在柳庆各属，刚开始积极从事于建设。则社会教育问题，亟待解决。故为灌输民众常识起见，首先就要注重宣传，或以文字发表，一纸风行；或以方言演译，随地宣讲，总的目的就是增进民智，教育普及，以达福利民生之目的。现柳江日报筹备就绪，将按期出版，于是文字宣传，就有了常设的组织机构了。但是乡间民众，没有文化的还是多数，要解决文字宣传所达不到的地方，应加以有组织、有系统之通俗演讲，两种方法并进，收效自然就大。所以柳江各属宣传所之组织，是刻不容缓，基此理由，拟具宣传通则及县宣传所组织大纲，并柳江日报社采访新闻派报收费办法案，让代表们在会上公决。

与此案同时提出来的，还有《宣传通则》、《县宣传所组织大纲》、以及《柳江日报社采访新闻及派报收费各办法》等文件，在《宣传通则》里，规定各县要成立宣传所，“凡小学校及私塾教师，均应指定为义务宣传员。根据柳江日报所记载各项，择要演讲之。”并要求各县宣传所，“对所属各分所、各宣传员，概以令行之。对柳江日报社，于必要时以公函行之。”^①

尤其要提出的是，还详细规定了柳江日报社采访新闻及派报收费办法：

最首要的是电话采访，为新闻敏捷消息灵通起见，特别规定在每县指定机关，专设电话机一台，由县知事派定访员若干人，每日将该县新闻，用电话报告柳江日报社，以便采访登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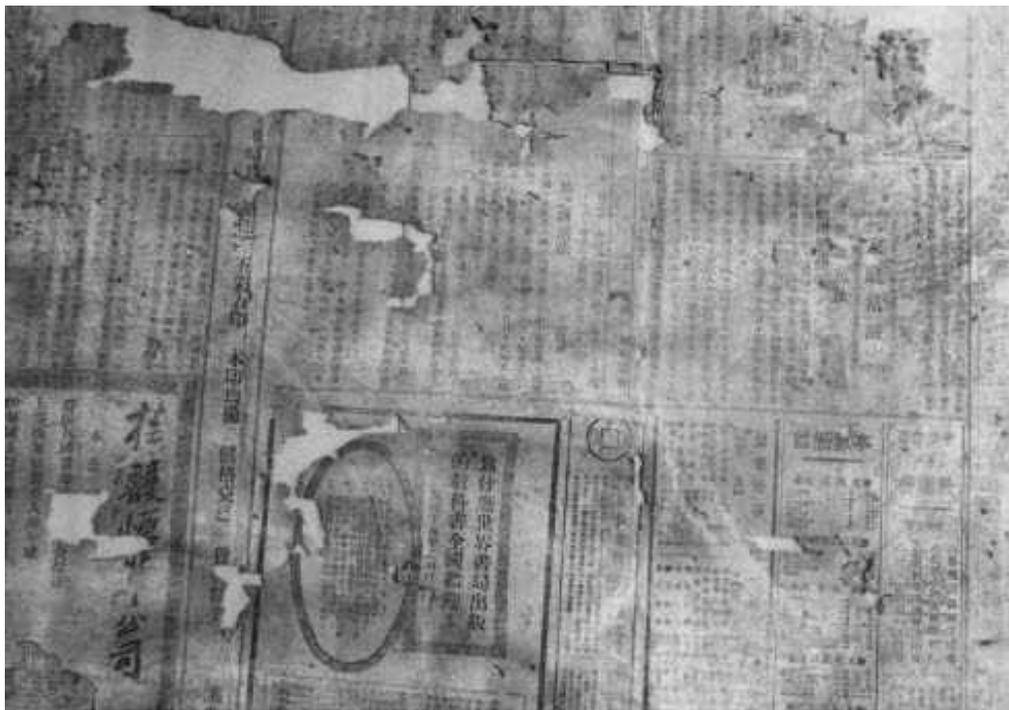
其次，由各县、各机关推选通讯员若干人，对于长篇记录或发表言论，即用文字通讯办法，三日一次发给报社，所用邮费，按月由柳江日报算还，并按文章等级付给稿酬。

对于报纸的派发，则是先由县署查明所属各机关民团局，下至村止，教育局下至私塾教师止，总数为多少份，汇函柳江日报社，以便照数寄报，直接交给县署分派。

对于收费也有明确的规定。因柳江日报出版物是非图利性质，只酌收纸料费及寄报费，每月报费暂定九角。所有各属派出报纸应收报费，由各县知事令饬各机关，按月缴交县署后转到报社。柳江日报社为省手续起见，由清乡总办公署支取，先在该县知事的薪俸中扣除。

以上各案均获得全部与会者的赞成通过。而以伍廷颺的秉性，他是说干就干的，他认为“凡事须贵大家商量讨论，一经决议就要实行，不要迟疑，不要畏难，至于犹疑不决，畏首畏尾，这是革命的人们所不许的，总之，我们作事，只问‘应作’‘不应作’，不必问‘成功’‘不成功’。”②

一切准备就绪，柳江日报终于在1926年8月正式出版。为三日一出四刊铅印小报，这是柳州官办公开发行的第一份报纸。由伍廷颺兼任社长，主任石维琼。



1926年创办的《柳江日报》

伍廷颺重视人才，延揽人才，既对罗琴谱、陈岳秀给予重用，同时与时任省立柳州第四中学校长的谢康也过从甚密。伍廷颺最初是经刘克初介绍认识谢康的，因为伍廷颺任柳庆总办后，“对柳江区一带的新建设，很有抱负及高度热忱。”

希望柳庆16县地方人士多多与他合作。而谢康的文笔颇健，国学基础亦有造诣，以省立四中校长的身份，在柳州教育、宣传、文化界有一定影响，虽说思想稍有保守，还是很为伍

廷颺赏识，在伍廷颺创办柳江日报、筹备成立柳江建设协进会、宣传交通建设民众与政府合作等方面，谢康都尽力加以协助。1926年11月，学潮波澜起伏，省立四中的师生为反对右倾的谢康推行制帽问题，组织“被压迫离校学生团”发动了集会游行的“帽潮”，声讨压迫学生的学阀谢康，谢甚为恼火，认为这是“极左倾分子横行无忌，破坏教育界及社会良好风气”。

当年底，伍廷颺邀约梁朝玠、谢康等同赴粤、港一带参观考察，次年初经梧州到达广州，在广州东山公医院借宿，伍廷颺即收到广西同学会的一份“欢迎伍厅长”的请柬，同学会的负责人还在电话中邀请谢、梁二人陪同伍厅长与会。谢康慨然允诺，十分愿往，谁知伍廷颺竟劝阻谢康不必同往，弄得谢康云里雾里的。

一个多小时散会后，伍廷颺与梁朝玠回来，告诉谢康说：“你不去真好，因为会场四周，尽是打倒你的标语，同时开会时的主席，也骂你为‘学阀’，你若出席的话，这个欢迎会岂不成了‘斗争会’了吗！”谢康听后半晌无语，一方面猜出伍廷颺事前可能得了什么消息，才劝阻自己不去开会，感激他的爱护，一方面觉得“共产党这种组织力量和团队精神真可怕。”谢康联想到曾在他任校长的四中当教员的张胆，就组织学潮，成功组织“被压迫离校学生团”在校外举行示威游行，大喊口号，矛头直指向谢康，弄得他心神不定好久。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通令全国“清党”，广西军政当局奉到密电所列的“黑名单”中，就有“跨党”的中共党员、正在柳庆党务整理处任副主任的陈岳秀，并指令要伍廷颺拘捕他并押解到南宁交军法处审讯。但伍廷颺不露声色，召集柳州清党委员会的成员，秘密商量稳妥之策，直到深夜，大家都劝伍廷颺“执行上级指示，不必迟疑，更不要放虎离山，养痍遗患。”

③

散会后，伍廷颺辗转难眠。国共合作的大好形势，陈岳秀、罗琴谱等勤恳办报的往事，一一在眼前浮现。天亮之前，他大胆地作出了一个决定，私下派人通知陈岳秀“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并连夜派车把陈送到武宣石龙，陈岳秀转乘柳梧轮渡逃往香港。事后谢康得知此事，颇为不满，但又无奈，乃至数十年后，仍撰文批评伍廷颺“恻隐之心太重”、“误用敌人”。

从上述对待谢、陈的两件事看，伍廷颺是尊重、爱护人才的，这两个政见不同的人，也都一齐为开办柳江日报及开展宣传工作同时出力献策，这说明伍廷颺能团结各方人士共同工作。尤其是在“清党”中对待陈岳秀的态度，也说明伍廷颺“为人忠厚爽直，胸无城府”。伍廷颺时任广西省清党委员会委员，他敢于违令不捕、“礼送”共产党柳州支部书记陈岳秀出境，

这肯定是要冒极大的风险的，他之所以这么做，除了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和国共合作有自己的理解外，或许还有爱惜人才、团结各方人士共同为建设柳庆献策献力，有他“喜见群贤毕集，匡济多才，民意攸同，建设斯易”的良好愿望。

办好一张报纸，在当时实属不易，不仅印刷设备要从国外购买，就连每月用油墨、印刷纸等，也要从香港进口。而最开始是由国民党省宣传部代购，由香港启昌公司发至梧州民国日报社，再由该社分期付款，后来省执委会改组，才由各报自行从香港启泰公司购进。1928年，天届寒冬，河水干涸，柳州的轮船只能航抵石龙，石龙以上，帆船始能运输，但迟滞缓慢，报社不得不提前从香港订购大帮纸料，以免影响出报。从中可见一斑。

同时，在经费上也并不宽松，在创办之初，伍廷颺就从柳庆公路总局的账户上，拨给柳江日报社57713.47元（桂币小洋）作为补助费。虽有订报收费的规定，但各县多数未能按时缴交。认真负责的如象县县长李镜堂离任交代，将欠交报费移交新任县长叶光华解交报社。而柳城县代收的221元2角的报费，不仅未按时交来，还挪作农运工作人员生活费之用，报社只得通报复函声明：各县必须执行柳庆清乡总办公署的通令，不得将订报收费移挪作他用，令其催交。不过，当时各县订报加起来也不过是一千余份，这些报费是“老鼠尾巴上长疮——有脓也不多”，问题的关键是上头的拨款也不能如期到账，如1928年7月的经费，迟至8月中旬尚未拨给，报社多次去电省政府催问，才姗姗来迟。

即便如此，这份报纸在当时还是起了许多积极的作用，如省宣传部令在报纸上另辟专栏，刊登省政府通过的各项条例、章程及决议案等等，以提高民众意识。又如为扩充新闻，从1928年10月4日起，特约梧州民国日报，将每日重要新闻用无线电拍发来柳，提高新闻的时效性。11月起，除广州、上海特约专电外，详细新闻在特约通讯外，还邮购快报，以满足读者之期望。尤其是柳州大火之后，开辟火灾善后专栏、特出号外新闻一张，宣传政府对于此次火灾的善后处置办法，及时地告之灾民与社会民众。

为提高报纸质量，伍廷颺曾请拨专款购买添置字粒，以解决缺字的问题。为扩大报纸的影响，先后开展了与南京、上海、南宁等地交换报纸的活动，也提高了柳州的知名度。

后来《柳江日报》停刊，并于1928年复刊，改名为《柳江国民日报》，负责人李巍，总经理陈坤培。

由伍廷颺创办的《柳江日报》，是新桂系“开放言论”的举措，是柳州有始以来的第一张

官办的报纸，成为柳州报业的先河，它的出现就令朝野瞩目，在报道时政新闻、表达民情輿情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新鲜事物。

① 《柳江各属行政会议纪事录》，载《柳州民国文献集成》第二集。

② 伍廷飏：《新广西建设之过去与将来》，载《新广西旬报》第二卷第十号。

③ 谢康：《怀念伍展空先生》，载《广西文献》第17期第41—50页。

柳江图书馆

伍廷飏在着手修筑道路、开办农林试验场，以及创办公医院、柳江日报等一系列实业建设中，都遇到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资料的收集、查找。有的科学技术书刊，还可以从外省诸如广东或香港等地购买。而图书之外，尤其是涉及本地资源、历史等方面的情况，必然只能从当地求索了。但在柳江，向民众提供书刊资料的图书馆一个也没有，供给书院学子们阅读书籍的藏书楼也是屈指可数。据资料记载，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广西巡抚马丕瑤认为“馆藏书籍，借归私家难以遍应，亦有散失之虞”。今州府“择书院及公所地方修建楼房，上藏书籍，下为士子看书之所。”①

为此，柳州府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建成藏书楼。地址在柳江书院院内。当年马丕瑤巡视后还算满意，认为“尚皆轩爽妥贴”，为柳江藏书楼题匾联。该楼最初所藏是江苏、浙江、湖南、广东、四川等省赠送的经史等书籍，后来又有广西书局的赠书。仅供书院师生所用，并不对外开放。清末，藏书楼随柳江书院一并迁移龙角街（今龙城路）。

但是，历经多年兵连祸结，藏书楼的状况可想而知。修建一栋像样的图书馆，自然也成为伍廷飏重视文化建设之必须了。1926年，伍廷飏派人从广东请来以刘旺来为首的技术工人，专门设计、建造柳江图书馆。为筹措建馆经费，当时还专门发行过公益彩票。图书馆馆址设在今公园路幼儿园一带，于1928年落成，总面积达600平方米，为砖木结构，中间无间隔的三层楼房。为当时柳州一座十分显赫的建筑物。后来，趁张任民赴南京开会之便，伍廷飏委托他特请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院院长、书法家于右任，写了一尺二寸见方的“柳江图书馆”五个大字带回柳州，把它镶嵌在二楼大门上面，为这座雄伟建筑增辉不少。这是柳州历史上第一家面

向社会开放的新型公共图书馆。



正在建筑中的新江图书馆
(1928年摄)

1928年9月，广西省政府计划在柳州举办广西物产展览会，大兴土木建设柳州，同时也为迁移省会作准备。身为省政府代主席、建设厅长的伍廷颺，在计划建筑省博物院、新旅馆的同时，趁此机会把柳江图书馆的规模扩大，升格为全省实业图书馆。他令陈腾凤拟具了一个在柳州《设立全省实业图书馆》的计划，计划称柳州于全省的地位最适中，交通最便利，工厂及实业

机关最多，最适宜建省图书馆。计划该馆能容纳10万册图书，建筑费3万元，设备费4500元，购书费2万元，聘管理人员10余人，月工资800元，杂费每月200元。此计划终因省会未能迁柳而未实现。

大约是因为经费紧缺，未能及时地配置人员，添置书报和向公众开放，图书馆还先后被学校、驻军、机关占用，其命运坎坎坷坷。

最先占用的是柳江县县长兼县中学校长陆希澄，他借用图书馆为县中临时校址。

1929年，两广战争爆发，张发奎与桂军合作办军校，看中图书馆，遂将县中撵走，用图书馆地盘开办军校无线电班。

1932年军校迁往南宁，县教育局和民众教育馆相继借用图书馆。民教馆报呈柳江县政府，请求将占用柳江图书馆的柳江县中学迁往新建校舍，而将昔日柳江图书馆，拨为民众图书馆。县政府批准这一请求，并在次年柳州县第一次县行政、教育行政会议上，以书面形式报告，报告说，自从批准将柳江图书馆拨为民众图书馆后，对其进行修理和添置用具，并由该馆阅览部主任兼任馆长，于去年11月1日开馆。其基本书籍，以前教育局移存者为多，此外新办及各界赠送者亦复不少。设立了阅报、阅杂志、借书、询问各处，以及成人阅览、儿童阅览、馆藏等各室。设管理员二人，按照图书馆组织，办理总务、选购、出纳、编目、典藏各项事务。现

计馆中书籍，加上已经定购的万有文库，共 3855 本，新购者共 418 部，各界赠送者 721 本，他处送存者 131 本，各地大小报纸 17 份，杂志刊物书报 20 种。现在阅书民众，颇形踊跃。只因该馆尚在雏形，一时还未能达到民众阅览之美满希望。

应该说，柳江图书馆在落成多年之后，才真正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虽然这是由教育局下辖的民教馆来掌管，但毕竟也是有益民众借阅书报，这大约是伍廷颺始料不及的。

但到 1934 年，桂系第七军驻防柳州，图书馆又被第七军占用。

到了 1935 年 10 月 4 日，在柳州各机关主管人员第一次联席谈话会上，由朱心源、黄家彦提出《拟请将柳江图书馆改成省立图书馆以倡文化案》上，对该馆的作用和前景作了呼吁。

朱、黄的提案说，柳州水陆交通商业繁荣，1928 年伍厅长廷颺联合士绅刘克初等，经营建筑柳江图书馆一所，工程浩大，形式巍峨。军兴以还，遂遭停顿，迄今仅成空馆，未免可惜。现值百废更新，文化建设曷可稍缓。且海内外人士旅游者日众，如能将该馆改成省立图书馆，充实内容，实足以提高文化教育。

此提案经再一次会议讨论后获得议决，决定用联席会议名义，由第七军部参谋处拟办，呈省政府核办。省政府不久电复，同意将柳江图书馆改为省立，拟派员筹备。

改为省立图书馆的事，后来终因迁移省会至柳州未果无疾而终，而柳江图书馆的命运，也因为抗战爆发命运坎坷，1944 年秋，被丧心病狂的日寇放火焚毁。当年柳州最雄伟壮丽的一座建筑就这样变成一堆焦土。

① 《柳州市文化志》第 276 页。

柳江平民工厂

民国初年，柳州的工业基础是十分薄弱的。1916 年 5 月，受梧州率先在广西开办电力厂的影响，柳州商人陈敬堂集资银元 5 万，在斜阳巷北段花门墩创办了柳州电灯公司，安装一台 48 千瓦木炭发电机组，每晚上供电 4 至 5 个小时，当时只能解决城厢官府及主要街道、商家的照明用电。因营业顺利，第二年添装一台 40 千瓦的柴油发电机组。1921 年因动乱，商务凋零，亏损严重，无力继续经营，于是年冬天停业。

直到 1926 年，柳州才有人在香笏街开办了石印社，印刷各种线香招牌纸，后来陆续在四码头开办了觉非石印社，印制学生习字本、方格本，直到同年的生盛印务局在中山中路开业，开始用铅字印刷，印刷业才稍有规模。另外，就还有一些手工制革的小作坊了。

1926 年，为供电需要，伍廷颺从其掌控的资金中拨出专款，选派人员将柳州电灯公司设备恢复供电营业，改称柳州电灯局。1928 年 10 月，柳州火灾，柳州电灯局直接损失东毫一万多元。城西南的配电线路被烧毁，烧掉用户灯和街灯 1140 支，占全城电灯（2700 支）的 42%。时任救灾总负责人的伍廷颺虽有心恢复电灯局的运行，奈何灾情太重，粥少僧多，只能尽量顾及灾民生活，难以拨出更多的款项补贴电灯局，并将电灯局改由县维持，因收入不敷支出，于年底歇业。

这些，也只能称之为柳州工业的雏形，直到伍廷颺开始创办平民工厂和之后的一系列建树，柳州工业才算得上真正的兴起与发展。

伍廷颺主政柳州之后，就想利用交通上的便利，开办一些工厂，既能增加地方税收，又能解决当地一些无业游民的就业问题。伍廷颺首先倡导的，就是开办平民工厂。

在 1926 年 7 月 1 日召开的柳江各属行政会议上，伍廷颺就把筹设平民工厂，收罗柳庆游民使其各习一艺以谋生活，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上。

随后，伍廷颺又主持通过了《筹设柳江平民工艺厂案》。

这一议案首先分析和评估了广西及柳州的条件，认为广西天然产物向称丰富，而柳江各县上连黔湘下通港粤。各种农业原料输出不少，但因为本地工艺不振，致日用所需反仰给外来，地方上因此造成贸易逆差，损失不小，使本省本地的市面银根短缺，人民生计艰难。尤其在兵灾之后，元气未能恢复，无家可归的游民日益增多，对市面上的治安也造成影响。故目前唯一的当务之急，就是筹设平民工艺厂以增加生产，并使平民各个学习一种技艺以谋生计，而且，有了工艺生产和商品输出，地方上钱财的漏洞也可以弥补了。

平民工艺厂的经费来源，计划将柳江各属 15 个县的屠牛捐收入的十分之七用来投放筹设平民工艺厂。因为过去为保护耕牛，曾有规定禁止杀牛，如今刚刚允许杀牛，恢复收取屠牛的捐税，那是很难筹集到大笔款项的。所以，开办第一间平民工厂，得由柳庆清乡总办先行设法借款建筑厂舍，购办机器，并成立办事处，规划一切。

第一平民工厂的厂址，决定设在柳州城厢附近。因为这里是柳庆各属总汇之区，无论哪一

项重要的政务，都是从这里先行着手。第二年再筹设第二平民工厂于庆远（宜山）。以每年收取的屠牛捐税收收入来举办一个工厂为开端，依次推行第三、第四厂，直到几十家上百家工厂，使平民工厂普遍各县。至于设厂先后，要看地方原料及工程师规划来决定。应该说，这一设想志存高远，的确是不错的，只可惜后来由于政治动荡和战乱等原因，未能如愿而已。至于各工厂应办何种工业，由工厂办事处根据实际调查，视地方需要程度，及原料供给多寡，妥为规划。

对于组织及管理，也有明细的规定，主要有：

工厂总办事处设于柳州，各厂分设主任，主任的职责是按照总办事处的布置，主理分厂的事务。由各县联合产生的董事会，对各工厂进行监督。董事有权利和义务查核厂内财政，以达经济公开之目的，同时负筹款维持及扩充工厂的任务。各工厂每年营业收支盈亏，待年终统计通盘筹算，得将某厂盈余，补助别厂之亏损，其余概预备扩充工厂，不作别用。各厂注重增加生产质量，提倡使用机器。但为容纳多数贫民，及便于推行起见，同时注重手工业的调配。工厂总办事处，附设工业试验场，于必要时，召开工业展览会，以改进和提高工业的水准。

实际上，创办平民工厂，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解决众多民众的就业问题，毕竟广西历经多年的战乱，百姓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不少人背井离乡，漂泊在外，桂中中心的柳庆一带，成为身无技艺的流民聚居之地。即便是当地居民，也因为受战乱之苦而无法正常地升学、习艺、就业。身为地方最高长官的伍廷飏，对地方的治安更有深切的体会，民无业不安，而创办平民工厂，使众多民众的生活来源得到保障，才是保证地方安定之根本，“推广人民职业，救济民生”，“收容柳庆一带游民，使其各习一艺”，就成了迫不及待的工作了。

为创办平民工厂，伍廷飏是不遗余力的，当初在柳江各属行政会议上，伍廷飏就认为：发展工业，当然要提倡机器工业，但一定要考虑一般贫民的出路，要通过手工业来调剂，给予手工业应有的重视。对于办厂的经费来源，虽说拟定以屠牛捐作抵，却因“目前屠牛捐收入甚少，而工艺厂亟待举办，但以牛捐作抵，目前情况万难做到”时，伍廷飏不惜以他个人的信用作为担保来向银行借款促成工厂的开办，“将来陆续用牛捐给还”。①

伍廷飏的住处，曾是旧督军陈炳焜的府第，宽敞整洁，人们习惯称之为“伍旅长公馆”。城里房舍紧张，伍廷飏干脆就把“平民工厂筹备处”的招牌挂在公馆前，甚至一些慕名而来参观的宾客，也就便住宿其中。人们为此领略了这位实干家的风采和行事作风，还有他那份盼办

厂成功的殷切之心。



柳江第一平民工厂木机部
(1928年摄于柳州)

此后不久，平民工厂即经筹备走向实施，第一平民工厂厂址设在马平城内的广东会馆里。在1927年时，该厂已有新式电力织袜机14架，织袜机3架，织布机50架。出品精良，价格低廉，为舶来品之所不及。伍廷颺又决定拨款扩充。按1928年的统计，经费是由指定的屠牛捐款项中拨给，每月约4000元，其出品为花布、洋袜、毛巾、线衫、冷

衣等，工人是从招收艺徒中获得，每三个月招一期，当时有艺徒三班，每班三十人，六个月毕业，前三月为学习之期，须自备膳费，三月后酌给工资，毕业后照所出物价，给七成，服务期满由其自由经营。艺徒尽系女子，该厂出品，运销于长安、融县、古宜、古州、庆远、怀远、贵州、中渡、雒容等地。

在平民工厂的带动下，柳州的轻工业、手工业也都呈现兴旺的势头，在北门街一带的织布业，约有100多家，每月能织出花布3000余匹。苏杭街一带的制革业有10多家，每月能制箱子1800只，皮革业每月能制熟皮100张，城外沙街肇昌视厂，每月能出肥皂200箱。

从以上材料看，该平民工厂已渐入正轨，颇有成效，可惜被1928年10月间的一场大火中焚毁，令人惋惜。

毕竟，创设平民工厂的好处已深入人心，伍廷颺又以建设厅的名义，对1928年11月18日黄勉“咨请建设厅拨柳江第一平民工厂扩充经费”的报告给予大力支持，“照原案办理”。

后来的继者，也都是尽快将平民工厂恢复。如第七军军长廖磊进驻柳州后，了解到开办经费有困难时，立即着令军部经理处拨出3000元毫币支援，并飭县整理党务委员会将党务余款数千元移作建设平民工厂之用。各界人士又组成15人的“重办平民工厂委员会”，在各方努力下，平民工厂终于在1932年8月15日重新恢复生产。第一批就解决了80多人的就业。人

们都说，伍旅长当年开了个好头，廖军长接着干。

① 《柳州民国文献集成》第二集第 45—58 页。

柳庆垦荒局

1927 年新年过后，伍廷颺日夜兼程赶到南宁，面见省主席黄绍竑。

“展空，柳庆方面修公路、建医院、办试验农场，各项建设日进千里，德邻、健生每次谈及，都赞不绝口，让我告慰展公辛苦了。”两人一见面，黄绍竑便转达李宗仁、白崇禧对伍廷颺的问候。

“季公过奖！本省建设突进，乃省政府力图兴革，民意之所向，职责之所在，何谓辛劳。”寒暄几句之后，伍廷颺便单刀直入地说：“季公，本人此次赴邕，有一要事相商。”

“有何要事？直言无妨！”黄绍竑亲自给伍廷颺倒茶。

“本省民十之后，经济破坏，民生凋零，地方纷乱，住民或死或逃，遗下荒田甚多。以马平为例，1923 年土地种植面积不及 1920 年的百分之七十五。据我所知，各县官荒土地，多归地主包占，无地人民平日种地住屋，须纳租钱，痛苦至极。本党欲改善民生，本省政府欲增加收入，除应用科学方法增加农产外，还必须设法增加耕地面积，减轻农民痛苦！”

“展空所言极是！我与斗寅（盘珠祁）日前正在筹划此事，拟在柳庆、田南设垦荒机构，先调查官荒，划清官地民田，再把官荒土地发给农民开垦，以扩大耕地面积。”

“此事先在柳庆试行，我打头炮！”伍廷颺与省主席不谋而合，非常高兴。

“你事事都是打头阵立头功啊！”黄绍竑笑笑说：“你回柳州拟出计划，急速呈文，交省政府会议议决。不过，放垦扩耕事多且杂，你物色谁来助你？”

“陈大宁！”伍廷颺早有准备：“此君毕业于国立北平农业大学，又在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林政研究，曾任绥远实业厅农业试验场场长，农垦方面乃一把好手，你让他到我柳庆，必有一番成就。”

“好你个伍展空！”黄绍竑满意地点点头，应允了伍廷颺的请求。

1927 年 3 月，省政府下文批准成立柳庆垦荒局，直属省政府。任伍廷颺为局长，陈大宁

为副局长。局址设在柳城县沙塘。



柳庆垦荒局沙塘林场苗圃房屋图
(1928年摄)

垦荒局业务共有七项：一、调查荒地。二、发放荒地。三、创办模范农村及市场。四、移民开垦。五、开办林场。六、清理逆产匪产。七、创办平民义学。

要办理这么多的事情，省政府只拨给垦荒局开办费 3000 元，每月经常费 872 元，经费远远不足。伍廷颺又与黄绍竑沟通，电请省主

席将沈鸿英、刘炳权散在柳城、罗城、雒容等处的逆产匪产，从三县知事手中拨归垦荒局，充作垦务经费。

接到省政府的电令，三县知事敢怒不敢言，只有奉命移交。

伍廷颺立即派出职员前往清查，计共查得沈鸿英逆产匪产的田产租谷 237360 斤，谷仓、田厂、铺户、住屋共 18 间，牛只 13 头，押当租谷 10316 斤。罗城刘炳权计共查得田产租谷 330521 斤，铺户、住屋共 57 间，牛只 56 头。有了这笔财产权，柳庆垦荒局开展业务的资金费用就相当可观了。

柳庆垦荒局设调查股、策垦股、总务股及四方塘、沙塘二个办事处，后来又增设沙塘林场、经济农场。调查股主管调查清理荒地、勘测地亩及调查与垦务有关的其他事务。策垦股主管移垦、放垦及专设农林场、农村等事务。总务股主管文牒案卷、收支款项等不属于各股的事务。

柳庆垦荒局职员不多，但在伍局长的督率下，各自努力工作。局办公室设在沙塘，原是大军阀沈鸿英的房屋，历经战乱已损坏不少。经雇工把门窗、炮楼板、屏风、楼梯等修理完后，又在门前筑路搭桥，栽花养草，左侧建牛栏，右边建厕所，整个办公环境搞得整齐美观，大大方方。

扎好营盘，雷厉风行的伍廷颺即着手开展各项垦务工作。一是草拟垦荒局组织章程，二是当月即在马平县属四方塘设立分办事处一所，委派技术员从事调查柳石路线、石牌坊、白面塘、狮子岩、四方塘一带的荒地；在柳城县属沙塘设立分办事处一所，委派技术员从事调查沙塘、

古木坳、风村、大小帽、上雷一带的荒地。调查结果，四方塘一带荒地面积南北约 14 里，东西约六七里。

听说政府设局开放荒地，老百姓非常高兴，大家都期盼伍廷飏快点放垦。但由于交通不便，民气闭塞，许多农民还不知道这回事，于是，伍廷飏责成总务股拟就宣传大纲，将柳庆地荒民穷的原因列举五项，详为解释，并将与垦民有关之各项建设事业及垦荒局进行概略分别说明，印刷 1 万份，每县发 500 份，转发各村张贴以广宣传。消息传出，各处来柳的垦民日益增多，纷纷到局请求给地耕垦。

此事令伍廷飏高兴，同时也出现垦民的住处、生活、生产等诸多问题一时难以解决。伍廷飏即指示垦荒局定出收容垦民的暂行规定：一是由附设各农林场收容垦民在场工作，以便各来柳垦民得有栖息处所。二是各垦民在场工作应享待遇及应受管理，与其它工人相同，须勤慎职务，遵守规则，服从指挥，勿得违犯。三是垦民来场，须具有地方官证明书或由殷实人介绍，取具保证书，呈由本局验明，乃得入场服务。四是来场工作垦民，无论男女老幼，凡能担任一种相当工作者，一律收受。五是垦民工作至某期间，欲自领荒地耕垦，或由本局直接发往耕垦。

但随着来柳垦民的不断增加，柳庆垦荒局不得不建立“模范村”来予以安置，且起到示范作用。伍廷飏根据陈大宁上呈的报告，批示同意在罗城县的泗州寺设立模范农村办事处，管理分设在牛鼻、地武、新下蒙的三个模范村。第一模范村牛鼻约有荒田 800 余亩，未耕畲地约 1000 亩，暂招垦民 30 户；第二模范村地武约有荒田 2900 亩，暂招垦民 60 户；第三模范村新下蒙有荒田 1100 余亩，暂招垦民 50 户。三个模范村共招垦民 140 户。

为保证垦民能更快地投入耕作，减少后顾之忧，垦荒局对垦民还订出了比较实际的借垫费用办法：

各垦民来垦，一切川资路费，由各人自备。到达农村地位后，所有房屋、牛只、用具、及第一年饭食、种子、肥料等费用，概由本局垫借。除房屋、牛只、用具、种子、肥料等有一定数目外，其饭食一次，每垦户暂以一人为限，每人月给 3 元。如有携带家眷者，其家眷饭食，则视经济情形酌予补助。其补助数目，应由垦户归还。

还款则暂定于开荒后 3 年清还：垦后第一年还本银 20 元，息银 8.16 元，合计 28.16 元。第二年还本 24 元，息银 5.76 元，合计 29.76 元。第三年还本息银 28.88 元。

柳庆垦荒局成立的当年，伍廷飏就派出三组人马，对马平、柳城、雒容、象县、来宾、迁

江、罗城、天河、融县、三江、忻城、思恩、宜北、河池、南丹等 16 个县，进行荒地调查。16 县合计查出荒地 2973 方里，荒田 33616 亩。马平、三江、雒容、宜山、忻城、象县等县之山岭，特别肥沃，堪以经营桐、茶、杉及各项杂粮者，不下 4000 方里。对于未能绘填图表的零散荒地，则附记于陆军测量局所制之十万分之一图中。当年请领荒地的，宜山 6 件、马平 3 件、柳城 3 件、雒容 2 件、象县 4 件。马平县刘克初、柳城县罗德扬、宜山县罗元济等均已发给承垦执照。自垦荒局颁布各项章程后，各村人平日被土著霸占不得使用的地面，业已解放，得以使用。各村农民皆纷纷向附近地面耕垦，各处种植比前进步。

当年 11 月，还开办了沙塘林场，开垦土地 170 余亩，播下树种 50 余种，造松树林 800 余亩，树苗 24 万株，油桐单纯林 1100 余亩 7 万余坎，桐茶混交林 100 亩 6800 余坎，马路树 1.6 万株，标本林 600 余株。

移垦方面，在沙塘附近木棉村背荒地筹办新农村，从思林县转来工人 74 名，划定地段，购置农具，每户给予土地 50 亩，牛 1 头，犁 1 副，着手垦荒。

伍廷颺调任省建设厅长之后，由陈大宁继任柳庆垦荒局局长。但是，柳庆垦荒局的建设大事，必须呈报伍廷颺审核批准。

沙塘附近有大帮土匪窝聚，企图骚扰垦殖，伍廷颺立即派出第一师部队往长塘、古灵等处驻扎防范。

1928 年，柳庆垦荒局属柳州造林事务所上报植树规划时，柳庆、柳榴两路路树的种植没有列入年度计划，伍廷颺当即指示，把两路路树纳入当年计划内。柳州至大塘长约 120 里，公路每边种植 2 行至 4 行路树，约 5 万余株；柳榴路长约 90 里，每边亦种 2 行至 4 行。柳州至雒容一段，植桐油树。雒容至鹿寨一段，点播苦楝及香椿，共植桐苗 3 万余株，种子 70 余斤。

1927 年 12 月间，由沙塘林场种植柳（州）三（江）公路路树。从柳州至沙埔，共分四段栽植。柳州至长塘坳一段，栽种枫香，每隔枫香苗木一株，间播苦楝种子一坎。长塘至古木坳一段，栽种千年桐。古木坳至古木村一段，种植铁凌树。古木村至沙埔一段，因苗木不足，只点楝树子。

1929 年 2 月，柳庆垦荒局归并广西农务局，而农务局局长正好又是伍廷颺。

柳庆垦荒局从 1927 年 3 月成立，至 1929 年 2 月归并，历时两年。在全局职员共同辛劳下，为柳庆 16 个县的建设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财富。

经技术人员翻山越岭的查勘验证，共批准发放官荒土地 67589 亩，其中，柳州 10269 亩、柳城 25700 亩、雒容 28281 亩、宜山 3339 亩。个人领垦占 19.13%，如柳城县长塘圩农民曾老三、曾老五、曾连四等，呈请领长塘圩背芋蒙岭脚坡地，耕垦种植各旱农作物等。全村民众领垦占 25.14%，如柳州近郊窑埠乡农民协会执行委员陶鸿卿、李海屏、黄建义等，呈请领该乡盘古庙附近荒山坡地种植桐茶，补助该乡学校费用。公司领垦占 55.73%。如 1928 年，柳庆垦荒局首次给柳江垦殖六合公司发放三门江西壤山一带官荒 2478 亩种植桐油树及套种杂粮。当时，正是广西大力提倡植桐，力图增加桐油出口之际，故陆续有人在适宜种桐的柳州开办垦殖公司，发展桐油生产，特别是三门江和里雍一带的土壤最适宜种桐，土质含沙质及粘土，排水畅利。

在荒山野岭、公路两旁大造林木。沙塘林场（后改称柳城林场）造成的林木 75 万株，另有可造林的苗木 40 万株。柳州林场（原马平林场）造成的林木 5.8 万株。宜山林场（原庆远造林事务所）造成的林木 39 万余株。

作为全省农村改造示范点的四个模范农村，有三个已初具规模。罗城泗洲牛鼻第一模范农村建好铺屋二排共 12 间，建圩亭一排共 9 间。每逢圩日，来赶街的老百姓约有 2000 余人之多。该村垦户已招足，各垦户又动手自己建造房屋。在莫离团新下蒙第三模范农村，建好房屋 7 间。沙塘新农村制好图型后，安置垦民 10 户，每户给坡地 50 亩，垦民已投入耕垦。

筹建中的马厂牧场、沙塘经济农场，均已烧砖制瓦，建房造屋，修路掘井。柳庆垦荒局还将沙塘沈亚基的房子加以修葺筑补，购置课桌板凳、书籍挂图，开办平民学校及阅览室，于 1928 年 6 月 1 日开始授课，聘沙塘村人叶绍章为教员。第一期学生有沙塘村人男女共 22 名，本局工役 16 名。每天晚上 7 时至 9 时上课。

柳庆垦荒局的示范作用，是伍廷飏任建设厅长前后推进广西农林建设的试点，在黄绍竑无保留的支持下，全省的垦殖出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从 1926 年到 1932 年，广西各县乡镇、村街均设立苗圃，为植树造林提供种苗。全省省营的林场有：柳城林场、柳州林场、宜山林场、雒容林场、茅桥林场、槎路林场、西乡林场、军山林场、桂林林场、龙州林场、百色林场，面积共 3.18 万亩，778.3 万余株。此外，还有私营林场 36 个，面积共 23.7 万亩，个人领垦林地 24437 亩。

从 1927 年到 1932 年，全广西共发放荒地 149 起，面积为 23.7 万余亩；耕地面积由清末的 899 万亩增加到 1933 年的 2989 万亩，扩大 3.3 倍。